

# 高教信息参考

2021年第4期(总第14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目 录

### 政策之窗

-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1
- 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在京召开 孙春兰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 4
-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 ..... 4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 6
- 谢伏瞻：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 ..... 6
- 谢伏瞻：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 ..... 8
- 再放权！财政部：高校可自主决定对持有的科技成果进行转让 ..... 17
- 《“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印发 ..... 18

### 热点关注

- 每年培训一百万名——新一轮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启动 ..... 20
- 深圳大学启动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 ..... 21
- 教师法修订将聚焦强师德提门槛保待遇 ..... 22
- 教育部多措并举强化基础学科建设 为拔尖学生畅通成长渠道 ..... 23
- 北京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支持高校创建二十家高精尖创新中心 ..... 24
- 清华压缩文科博士规模引发热议 ..... 25
- 习近平提到的“战略科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 26

### 高教快讯

- 9月-10月高教快讯汇编 ..... 29
- 2021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公布 ..... 33

### 学术探讨

- 构建全方位培养体系 培养心怀“国之大者”的拔尖人才 ..... 34
- 未来课堂如何求“变”？ ..... 37
- 新文科人才培养何以实现？ ..... 41
- 略论现行评价机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危害 ..... 53
- 交叉学科专业如何设置？美国常春藤高校这么做 ..... 63
- 哈佛大学的三次转型：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生成的历史经验 ..... 67

## 【政策之窗】

#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9 月 27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王沪宁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的重大判断，作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快速壮大，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才比较优势稳步增强，我国已经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我国人才工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一是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三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是坚持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五是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六是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七是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八是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上 8 条，是我们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我们的目标是：到 2025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在关

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 2030 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对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在主要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拓者；到 2035 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

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进行战略布局。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集中国家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为人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用人主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确保下放的权限接得住、用得好。用人单位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用不好授权、履责不到位的要问责。要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要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同时要建立健全责任制和军令状制度，确保科研项目取得成效。要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优化整合人才计划，让人才静心做学问、搞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要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习近平强调，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国家队作用，围绕国家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要优化领军人才发现机制和项目团队遴选机制，对领军人才实行人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的特殊政策。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要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

习近平指出，要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要培养造就大批

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对待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要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允许失败、宽容失败，鼓励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要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

习近平强调，做好人才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鼓励人才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广大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事”，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要优化人才表彰奖励制度，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尊重人才的风尚。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实际、突出重点，解决人才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要加大人才发展投入，提高人才投入效益。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各级政府教育、科技、工信、安全、人社、文旅、国资、金融、外事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共同抓好人才工作各项任务落实。

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才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入分析了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是指导新时代人才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做好人才工作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生动实践，不断开创党的人才工作新局面。

王沪宁在总结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推动党中央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效。要抓好会议精神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出席会议。

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中管金融企业、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管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原文载于新华社 2021 年 9 月 28 日）

## 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在京召开

### 孙春兰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 10 月 12 日在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以全面提高教材质量为重点，创新教材建设理念，增强教材育人功能，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

孙春兰指出，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立德树人的基本载体。教材建设要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要坚持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加强教材系统规划和建设，根据不同学段学科、不同类型教育的特点，推动大中小学教材、不同学科教材有机衔接，既要传承经典、保持课程内容相对稳定，也要与时俱进、体现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要加强教材全过程管理，只要进入校园、进入课堂、进入书包的教材必须严格把关，规范选用机制，形成高质量教材有效普及、劣质教材加速淘汰的机制。各地各部门和学校要加大经费、人员、项目等支持，加强教材队伍建设，加快形成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10 月 12 日）

##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主渠道。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内在要求，对于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彰显中国大学社会主义底色，引导青年学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各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同时，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

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教育教学、研究宣传、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差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亟待加强。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意见》明确，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学和研究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明确职责使命，推动内涵式发展，强化政策保障，着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人才支持。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谋划，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规律、学科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意见》指出，要扎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把准学科定位方向，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在政治引导、学理阐释和价值塑造上下功夫，提升教学实效。强化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全面贯彻、有机融入各门课程，切实提升教材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找准切入点、聚焦点、结合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着力打造一支信仰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数量充足、结构优化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切实增强使命感、认同感、获得感。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源源不断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备人才。

《意见》指出，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政策支撑机制。以育人成效为标准，完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点、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在要求、有利于教师职业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培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为目标，完善培训体系，加大支持力度，健全教师成长激励机制。牢固树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理念，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日常思政工作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阵地建设，培育和夯实发展平台，构建平台支持体系。建强建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提升发展质量，强化示范辐射，加强建设管理，以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为牵引，推动形成各类马克思主义学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体推进的局面。

《意见》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和统筹规划。宣传、教育等部门要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提供有力政策指导、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单位要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给予优先保障。要严格督导考核，在结合巡视巡察开展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中，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情况的检查力度。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列为所在单位党的建设考核、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内容，作为所在单位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推动建好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9 月 21 日）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义。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实现大学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意见》提出，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高校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和素养培训，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打造一批高校创新创业培训活动品牌。完善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可持续发展机制，鼓励各学段学生积极参加。坚持政府引导、公益支持，支持行业企业深化赛事合作。

《意见》明确，要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校内各类创新创业实践平台面向在校大学生免费开放。鼓励各类孵化器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开放一定比例的免费孵化空间。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深入实施创业就业“校企行”专项行动。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做好大学生创新项目的知识产权确权、保护等工作，加快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加大对创业失败大学生的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大学生创业风险救助机制。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信息服务，及时收集国家、区域、行业需求，为大学生精准推送行业和市场动向等信息。加强宣传引导，总结推广各地区、各高校的好经验好做法。

《意见》提出，要加强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财税扶持和金融政策支持。加大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支持力度。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做好纳税服务，强化精准支持。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商业可持续原则对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金融服务，解决大学生创业融资难题。引导创新创业平台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参与大学生创业项目早期投资与投智。

《意见》要求，教育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指导，督促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各项政策的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研究制定和落实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及时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10 月 12 日）

### 谢伏瞻：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8月24日，在北京举办的“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欧洲”学术

研讨会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以下简称“欧洲所”）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这样说。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加强对欧研究的指示精神，欧洲所前身——西欧研究所于 1981 年 5 月正式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当代西欧问题研究的国家级学术机构。

谢伏瞻表示，40 年来，欧洲所坚持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密切跟踪欧洲发展进程，不断完善学科布局，构建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国际关系等为基本框架的学科体系，成为国内学科门类最全、科研实力最强、学术影响力最大的欧洲综合研究机构，培养出一支政治过硬、学风优良、业务精湛的专业人才队伍。

40 年来，欧洲所一代代专家学者坚持以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在欧洲福利国家、欧洲一体化、欧元、欧洲发展以及跨区域合作模式等方面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制定对欧战略与政策提供了学术支撑，为推进中国欧洲研究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作出积极贡献。

40 年来，欧洲所坚持开门办所，不断深化与国内外的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设立中国中东欧研究院，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等平台，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以坚实的步伐日益走进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央，成为我国对欧传播中国倡议、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排头兵。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谢伏瞻对欧洲所提了四点希望。他指出，欧洲所的同志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自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到研究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

二要心怀国之大者，促进中欧研究不断出思想、出理论、出对策，立足中国实际，始终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紧贴党中央决策需求，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

三要加快话语体系建设，提高国际传播水平和能力，发挥好中国中东欧研究院等平台的作用，凝聚思想共识，促进务实合作，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四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欧洲研究人才高地，科学把握科研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在引才、育才、用才方面下更大工夫，不断破除人才发展瓶颈，为新时代中国欧洲研究提供人才支撑。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孔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灵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等嘉宾一同出席活动并讲话。欧洲所所长冯仲平主持会议。多位学界、业界专家围绕中欧关系问题在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来源：人民网 2021 年 8 月 26 日）

## 谢伏瞻：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鲜明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深刻指明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前进方向。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篇章。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我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加全面、更高水平履行党中央赋予我院职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环节。

### 一、新时代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就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2015 年 11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要根据时代变化和现实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努力，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2019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2020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2021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教育界联组会时强调，要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思想、论述和指示，同持续学习贯彻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三次致我院贺信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并作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解答。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都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最新发展，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些重大命题都是综合性的、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采取散兵游勇的方式，依靠单一学科领域的知识很难作出科学解答。从学科发展趋势来看，跨学科、交叉科学融合发展，自20世纪中叶开始就是一大潮流。本世纪以来，这种潮流愈加势不可挡。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融合研究，不断出思想出理论出对策，是哲学社会科学顺应新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我院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学科众多、覆盖面广，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都是我院的优势。我院要切实发挥国家队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头羊”“带头雁”，就必须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出高水平的推动文明进步的基础理论成果，又出高水平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对策成果；既出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学问家，又出熟悉党情世情国情的战略家和各领域、各方面的专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花大气力，在两类研究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此，我院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才能充分发挥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才能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应有贡献。

## 二、提高基础理论研究水平，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

基础理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也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源头。唐代魏征曾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往往是建立在基础理论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带来研究范式的转换，创立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新概念、新方法，产生原创性标志性成果。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深度和学理厚度，决定着应用对策研究的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和精准程度。没有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对热点问题的跟踪看似热热闹闹，实际上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不断低水平重复。有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应用对策研究就能够在“人所共知”之处提出不为常人所知的主张，在“人所不知”之处提出需要高度关注的新变化新特点。基础理论研究得越深，对策研究就越有思想高度，提出的建议就越高明、越管用。我院与国家部委的研究机构相比，优势在于有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能够开展建立在基础理论研究之上的应用对策研究。我们的老院长胡乔木同志曾经指出：

“哪怕是我们在研究一些最实际问题的时候，例如调查某一个地方，写出某一个地方的情况、经验的调查报告，作为社科院派出去的调查组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应该和其他的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至少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要力求对所调查的事实作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和解释。”简而言之，有好的基础理论研究，才会有好的应用对策研究。

如何实现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全院同志共同努力。这里，分析几个典型案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

#### 案例一：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毕生精力创作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分析了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奴役性质、虚幻性质，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资本的“秘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就是剩余价值，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资本论》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恩格斯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剩余价值学说，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力清除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影响，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和思想统一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随着《资本论》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占据主导地位，世界各地都相继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并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依据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这是实现基础理论研究向应用对策转化的根本目的。

#### 案例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

毛泽东同志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矛盾论》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强调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也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矛盾论》《实践论》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矛盾论》《实践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结出了《论持久战》的应用对策硕果。《论持久

战》创作于全面抗战爆发之际，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即如何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分析战争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依据国内国际现实矛盾的变化，客观全面分析形势，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逐渐发生变化，中国终将战胜日本侵略者。从而有力地批驳了社会上弥漫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论调，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论持久战》还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战略和策略。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活生生的对策，为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哲学家冯契曾说，“《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可以说，这本书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

### 案例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早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提出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蕴含着科学的自然观，体现了自然辩证法，是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造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引和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认真落实生态环境相关多边公约或议定书等，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迪。推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其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

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要提高基础理论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基础理论研究是我院的传统优势。正是由于历史上曾经汇聚的一大批学术大师，推出的一系列厚重的学术成果，确立了院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的地位。近年来，我院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部分基础研究学科出现下滑，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高基础理论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核心是抓住原创这个关键，着力推动重大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创新，推出具有时代高度、代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必须下大气力、下苦功夫，必须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执着坚守，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下决心改变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脱节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专门谈到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做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如果整天只是在空洞的概念上转来转去，搞纯粹的理论思辨，“坐而论道”，把生命都耗费在诸如“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的经院哲学问题上，那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学问。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

### 三、聚焦时代主题，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

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繁荣发展的根本途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其正确与否，进而推动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注重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升华，不仅能够提高对策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有利于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如何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这里，我列举两个经济学的案例。

#### 案例一：凯恩斯开创现代宏观经济学

1929年“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最广泛、最持久的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长期失业问题，同时出现了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冲突。“大萧条”成为当时最重大、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纷纷参与到“大萧条”成因和反危机政策的研究当中，试图提出解决之道。受古典经济学“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影响，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信奉“自由放任”，相信市场的供求力量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要么推崇市场自然调节，要么主张减薪、加税、紧缩银根、提高关

税等，但这些手段在实践中不仅无效，甚至适得其反。凯恩斯在与美国罗斯福“新政”的紧密互动中，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乘数原理”等理论。他认为供给并不能自动创造需求，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恢复均衡，主张通过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干预实现充分就业，从而走出危机。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可以说，正是在应对“大萧条”的对策研究中进行理论升华，造就了“凯恩斯主义革命”和现代宏观经济学。

### 案例二：张培刚开创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独立。这些国家大都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工作期间，围绕农家经济、农民生活、粮食生产等，在全国多地开展了6年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反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把自己掌握的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当时最前沿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自成体系地提出了完整的工业化理论，指出农业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这与当时很多人主张的“农业立国论”或“乡村建设论”明显不同。张培刚关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基础工业的“先行官”作用、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等学术观点，提出时间远早于舒尔茨、刘易斯、赫希曼等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为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这里仅仅列举了经济学中应用对策研究升华为传世经典理论的例子，相信其他学科也有不少成功案例。这些案例，在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方面，给我们几点启示。一要立足实践。传世经典往往是来自于对那个时代实践的提炼概括，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如果脱离鲜活的时代实践，搞所谓的“纯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是产生不了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检验的伟大成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少问题难以用现成的理论、观点、学术思想解释，这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二要善于提问。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思想史上一切伟大的创造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应用对策研究处于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的最前沿，既要关注当前的、短期的问题，也要研究规律性、制度性、长期性问题。三要勇于创新。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那就不仅没有独创性，而且往往会“削足适履”甚至“南辕北辙”，既解释不了中国实践，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更推进不了理论创新。

要聚焦时代主题，立足中国实践，善于从应用对策研究中提炼引领时代变革、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大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主攻方向，在应用对策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探索科学规律。要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应用对策研究中，多学科多维度、系统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书写研究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经典。近年来，我院在中美斗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社会治理、“一带一路”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国家安全、中华文明溯源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应用对策研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评价。下一步，要用好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深入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趋势，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党领导人民正在深入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许多应用对策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更要在应用对策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为现代化理论的创新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理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治理等新兴、交叉领域也有诸多理论空白，要在及时准确把握其特征和趋势的前提下，推动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升华。

#### 四、心系“国之大者”，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

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缺一不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是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针和优良传统。建院40多年来，我院在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方面积极探索，取得显著成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充分发挥了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

这里提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比如，关于包产到户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社会上包产到户是“独木桥”还是“阳关道”的激烈争论，农发所、社会学所的学者们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结合生动的实例和翔实的数据，回应社会质疑，坚决支持包产到户，在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党中央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重要贡献。再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1979年，对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应当从何入手，理论界存在很大分歧。工经所的蒋一苇同志，基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改革应当从企业入手，把充分发挥企业主动性作为基本出发点，形成了企业本位论。其主要观点是，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些观点对于深化企业改革，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企业本位论》正式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将这篇文章作为文件下发给与会

代表参考。又如，关于人口问题研究。早在 20 多年前，国家还在严格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我院学者就对人口问题开展跟踪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列，在此后的不同阶段都提出前瞻性研究成果，为党中央调整人口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站到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又如，关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前夕，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法学所王家福同志讲授了《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次法律知识讲座对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是我院对国家法治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以上主要涉及经济学、法学等应用学科，我院一些基础学科也有很多成功案例，特别是近几年，文哲学部、历史学部在研究成果应用对策转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以上案例表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既能推出高水平基础研究成果，又能拿出高水平应用对策成果，我们要有这个自信。我院历史上的优秀学者无不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在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创新信心和决心，攻坚克难、追求卓越，最终取得骄人的成绩；无不怀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弘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良传统，与祖国同行，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关键是要胸怀“国之大者”，围绕国之大局、国之大要、国之大事、国之大计，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回答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所指明的方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持续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特别是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关心什么、需要什么，始终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紧贴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需求，推出更多对政策制定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事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优秀成果。要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目标，以回应人民重大关切、解决人民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使命，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

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就我院整体而言的，并不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员、所有的科研项目都要融合。就全院来说，有的研究所理论研究任务多一些，有的研究所对策研究任务多一些，都是合理和正常的；有的科研人员愿意并擅长做基础研究，也有的有兴趣并擅长做应用研究，两者都需要；有的人某个阶段可以有这样和那样的侧重，这都是可能的，都应该支持和鼓励。当然，如果善于把两者融合起来，既能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又能做好应用对策研究，那就更好了，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五、以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领导**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贯穿我院全年工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院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效，把教育活动成果转化为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动力，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发工作的实际行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正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要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武装全院干部职工的头脑，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专著、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持续推进正风肃纪，驰而不息整治“四风”，建设风清气正、严谨自律的学术生态。要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层层传导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压力，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严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要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抓好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抓好科研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的研究工作氛围和环境。

推进制度创新，着力解决制约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加快形成促进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一要加强研究所领导班子建设。领导班子是一个单位的“火车头”。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研究所业务负责人是本学科带头人，不仅本人研究水平要拔尖，还要善于抓“三大体系”建设，善于培养年轻一代，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样才有利于带队伍、出精品。要注重班子梯队建设，真正把那些忠诚干净担当、业务拔尖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选任到研究所领导、研究室主任的岗位上来，为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二要优化科研组织方式。推动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科研组织方式不能是单打独斗、散兵游勇，而是要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形成综合研究团队。要设置一批重大问题研究课题，打破学科、研究所、学部的界限，通过调动全院力量联合攻关，共同推出代表我院核心竞争力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可以先搞一些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开。要更好发挥创新工程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中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鼓励各所在推进创新工程项目时，向兼顾两类研究的题目倾斜；鼓励基础理论研究类学科关注现实问题，并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对策转化；优化创新工程考核机制，实现两类研究成果在推出时间上的有机衔接，支持科研人员出精品力作。要处理好学科建设和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关系，继续加大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对相近学科进行整合，壮大学科力量，将团队效应发挥出来。三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要认真研究《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充分吸收其中适合我院的经验做法，完善我院评价机制。要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做到个人研究和集体研究的绩效大体相当，推动形成鼓励集体攻关和合作研究的氛围。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坚持代表作评价制，既强调成果质量、原创价值，也要重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贡献。四要在开门办院中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不断密切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联系与合作，特别是要通过重大

科研项目，吸引哲学社会科学界高水平专家学者联合攻关，提升研究成果质量。加强同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互动交流。要与世界展开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的思想和学术对话。通过举办高端论坛、合作研究、对外培训、翻译出版、新媒体传播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不断提升中国学术和高端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话语权。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实施好中国社会科学院“讲述中国工程”，将我院学术和智库研究优势有效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总之，对于有悖于融合发展的陈规旧章，要修改废止；对于有碍于释放融合发展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决心砍掉，尽快形成有利于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在引才、育才、用才方面下更大功夫，不断破除人才发展瓶颈，构建与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机制和环境。一要择优引才。要根据战略需要，前瞻性地引进一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综合性人才；要主动出击，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能引领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帅才；要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持续引进有潜力的高水平青年人才。要严把“进人关”，提高引进门槛，择优引进人才。二要精心育才。引导科研人员树牢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知识，提高理论水平。要通过培训、讲座、专题辅导等形式，拓宽视野，扩大交流，增长知识，弥补短板，提高能力。要关心支持那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立志做大学问、真学问的青年科研人员。要完善“传帮带”机制，使其在学术传承、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发挥好社科大和博士后制度的人才“蓄水池”作用，为两类研究融合发展培养后备人才。三要科学用才。树立人尽其才的“大人才观”，将各年龄段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都发挥出来。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1 年 8 月 30 日）

## 再放权！财政部：高校可自主决定对持有的科技成果进行转让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为规范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行为，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和完整，保障国家所有者权益，近日，财政部制定并印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提到，高校可自主处置已达使用年限并且应淘汰报废的国有资产，取得的收益，留归高等院校；并且可自主决定对持有的科技成果进行转让，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

### 高校可自主处置已达使用年限并且应淘汰报废的国有资产

关于处置权限和要求，《办法》提到，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国有资产处置，由各部门审批，其中，已达使用年限并且应淘汰报废的国有资产，由高等院校自主处置，并将处置结果按季

度报各部门备案。

并且，《办法》明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自主处置已达使用年限并且应淘汰报废的国有资产取得的收益，留归高等院校，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

### 高校可自主决定对持有的科技成果进行转让

针对国家设立的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持有的科技成果，《办法》提到，可以自主决定转让，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及关键核心技术外，不需报各部门和财政部审批或者备案。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及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成果转让，由各部门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制度的规定审批。

在科技成果转让时，《办法》规定，国家设立的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将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转让给国有全资企业的，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转让给非国有全资企业的，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通过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

此外，《办法》明确，国家设立的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主要用于对完成和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和报酬、科学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2021年10月11日）

## 《“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印发

近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了《“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这是首次就“党的领导”相关内容一体化融入大中小学课程教材作出的整体设计，是在大中小学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教育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具有重大意义。

《指南》坚持正确价值导向、遵循认知规律、加强整体设计、强化育人目标，突出政治性针对性统筹性实效性，强调综合运用多种载体形式推进“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课程教材，努力实现整体布局与分科安排科学有序，学段学科全面覆盖，理论内涵充分阐释，学习要求循序渐进，全面提升课程教材铸魂育人功能。教育引导学生在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指南》概括提炼了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等4个方面的主题内容，并具体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38个“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要点，为课程教材建设提供基本依据。

《指南》根据各学段特点提出要求。小学阶段重点呈现党的领袖故事、英雄事迹、重要事件、重大成就等内容，培养学生热爱党、拥护党的领导的感情。初中阶段重点介绍不同时

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理论成果和建设成就，引导学生夯实拥护党的领导的信念根基。高中阶段重点解析党的先进性、革命性、人民性，帮助学生形成拥护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大学阶段系统介绍党的领导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体制机制，阐释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教导学生践行拥护党的领导的使命担当。

《指南》对不同课程教材有机融入作出安排。中小学阶段以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为主，艺术有重点地纳入，其他学科课程教材有机渗透。大学阶段以思政课和政治学类为主，法学类、历史学类有重点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其他课程教材和理工农医类、军事类课程教材结合各自特点有机融入。

据了解，《指南》对组织实施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加强专业指导、做好实施细化、强化培训培养、加强教学研究，确保“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融入不同学段课程教材的准确性、系统性、及时性、有效性。（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1 年 10 月 25 日）

◆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纲要》提及多条涉高等教育内容，如扩大高校知识产权处置自主权；鼓励高校建立专业化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支持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自主设立知识产权一级学科；依托相关高校布局一批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加强相关高校二级知识产权学院建设等。

◆ 近日，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广告发布管理的通知》，部署开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违法违规广告专项整治行动。《通知》要求，高校应严格履行办学主体责任，完善广告宣传统一归口管理制度，不得发布无高校法人书面授权或省级自学考试管理机构审查备案的相应广告及其他违法违规信息。

◆ 9 月 30 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官网发布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规划》明确：

要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聚焦国家、北京和特定领域的核心需求设置专业，突出重点领域、促进学科交叉，大力开展前沿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支持高校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

要提升本科教育教学水平，深入开展教学改革研究。持续推进“双培计划”“外培计划”。广泛开办大学生学科竞赛，大力建设校内外实习实践平台。持续深化“北京学院”“卓越联盟”建设。鼓励在京高校与国内外知名大学、机构和企业开展人才培养交流合作。

【热点关注】

## 每年培训一百万名——新一轮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启动

姚亚奇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决定实施新一轮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

据悉，工程将聚焦科技自立自强、聚焦“卡脖子”问题、聚焦高质量发展、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以人才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培养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为重点，围绕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主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开展大规模知识更新继续教育，每年培训 100 万名创新型、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壮大高水平工程师队伍，推进分类分层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体系建设。

工程设 4 个重点子项目，一是高级研修项目，按照高水平、小规模、重特色的要求，每年举办 300 期左右国家级高级研修班，培养 2 万左右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二是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项目，以更新知识结构、掌握先进技术、提升专业水平、提高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每年培养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90 万人左右。三是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主要面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集成电路等数字技术技能领域，实施规范化培训、社会化评价，每年培养培训数字技术技能人才 8 万人左右。四是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设项目，分期建设一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建立退出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同步推进培训项目、专家师资、教材课程、课题研究、在线学习等建设，更好发挥基地培养人才的平台作用。

2011 年至 2020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共同实施了第一轮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工程实施 10 年来，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 12 个重点领域和现代物流、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 9 个现代服务业领域，累计开展 1264.3 万人次的知识更新继续教育活动，建设了 200 家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完成每年百万人次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任务。（来源：《光明日报》2021 年 10 月 12 日）

## 深圳大学启动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

刘 盾 马 妍 李世卓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30 万深圳大学校友可再回母校，申请使用食堂、操场、会议室等资源。近日，深圳大学举行“深圳大学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启动仪式。该计划以“终身学习、积极进取、共同成长”为教育和服务理念，依托学校教学科研特色和资源优势，继续服务校友和校友企业。

据介绍，该计划涵盖校友论坛、校友课堂、图书资源等五大模块。深圳大学校友可定期参加“校友论坛”，聆听各行业领袖分享；可修读每学期免费开放的 2000 多门课和 500 多门线上“慕课”。校友还可以免费使用图书馆图书和数据资源；周末可在食堂用餐、使用学校部分体育场，可优先预约校友活动场地。目前，学校已有 1 个多功能厅、7 个展示厅和洽谈室、1 个候会室可使用。学校创建“校友信息中心”，建立校友信息资源库等，实现校友资源共享。

“一流的高校需要一流的校友工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清泉表示，校友与母校的关系水乳交融、持续支撑。在终身学习的新时代，学校着力打造“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多维度、全方面为万千校友和校友企业服务、赋能，将拓展大学社会职能的广度和深度，打造学校与校友深度融合的“终身发展共同体”。

“面对母校，面对老师，我永远是一名荔园学子。”深圳大学校友、深圳南山区委书记曾湃说，母校启动“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彰显深圳大学人才培养特色和服务社会的价值追求。

启动仪式结束后，首场校友论坛“开讲”。作为深圳大学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的重要部分，校友论坛计划每个月举行一次。

据介绍，办学 38 年来，深圳大学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培养了 30 万创新创业人才。学校校友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建言献策，校友企业成为在校生实习实践和校企融合发展的重要基地。（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1 年 10 月 11 日）

## 教师法修订将聚焦强师德提门槛保待遇

胡 浩

随着我国教师队伍的规模、质量、结构发生变化，教师法修订提上日程。受国务院委托，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月 21 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法实施情况时介绍，教师法修订工作加快推进，形成了修订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于 1993 年颁布。多年来，我国教师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专任教师总数由 1993 年的 1097.89 万人提高到 2020 年的 1792.97 万人。教师学历水平不断提升，广大教师职业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然而，对标教师法的规定，对标教育改革发展需求，对标广大教师的期盼，教师队伍建设工作还存在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教师法的多项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要求，需要进行修订。”怀进鹏说。

据介绍，教师法修订工作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研究、反复修改基础上，目前已形成了修订草案。

怀进鹏说，教师法修订将聚焦加强党对教师工作的领导，确保教师队伍建设政治方向正确。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明确教师职业定位，强调教师承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此外，教师法修订将明确教师权利义务，增加教师教育教学自主权、教育惩戒权和对创新内容的知识产权等，强化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救助义务。提高教师准入门槛，提高各级各类教师学历要求，建立教师从业资格审核把关机制，把好准入关口。健全教师聘任和管理制度，明确教师职称评聘应当与岗位设置相结合，在教师考核评价中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和立德树人导向。

为确立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教师法修订将强调加强培养培训，建立公费师范生制度等。强化待遇和保障，分类建立保障机制，建立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工资分配制度和晋级增薪机制，落实为教师减负要求，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完善教师奖惩制度，明确教师表彰的要求，细化教师违规情形和处理办法。

怀进鹏表示，将按照法律修订程序，加快工作进程，进一步完善修订草案，尽快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来源：《中国教育报》2021 年 10 月 22 日）

## 教育部多措并举强化基础学科建设 为拔尖学生畅通成长渠道

晋浩天

9月，来自河南郑州的高考生仝本然正式迈入北大校园。通过强基计划，他被录取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从小学起，我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正式接触数学竞赛开始，我才深入了解到数学的博大精深，数论组合里那一个个巧妙的证明都令我不禁赞叹。也正是在那时，一个数学梦在我的心中扎根。”仝本然说。

2021年，在强基计划实行的第二年，北大强基计划共录取930人，其中破格入围并最终录取学生369人。这也释放了一种积极的信号——为拔尖学生脱颖而出“设通道”“搭平台”。据了解，去年年初，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实现招生培养良性互动。

### 系统性重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两年来，“强基计划”蹄疾步稳，不仅反映出我国教育的特性和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还服务于国家发展基础研究，系统性重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战略需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阎焜说：“在‘强基计划’出台之前，我国拔尖计划在人才选拔和培养环节存在一些误区，如缺乏对学生基础学科研究志向、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的培养，也忽视对学术探究热情的激发和保护，使学生对基础领域知识探究望而却步。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基础学科高质量人才的需求，有必要对拔尖人才培养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强基计划’通过精心的制度设计，并集中优质资源，势必能够将有志趣、有天赋的拔尖学生培养成为未来基础学科领域的栋梁之材。”

这只是教育部在持续推进人才强国建设的一个缩影。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选拔、培养、评价等关键环节，教育部推进深层次改革，加强针对性引导，为有志向、有志愿、有志趣投身基础研究的拔尖学生畅通成长渠道。教育部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深化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改革，吸引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部分学生已在相关领域崭露头角。启动实施“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行动”，倾斜支持数学、物理等学科，构建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协同机制。

更引人注目的是，教育部还探索顶尖人才选拔培养模式，指导清华大学实施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该计划今年共录取69名有志向、有天赋、热爱数学的学生。记者了解到，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将通过“3+2+3”的本博贯通模式对他们进行专门培养，以期将他们培养成为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能够引领中国乃至世界数学及相关应用领域发展的领军人才。

来自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中学的双胞胎兄弟程梓峻、程梓桐从小都对数学情有独钟，立志

为数学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今年，弟弟程梓桐通过丘成桐数学领军人才计划选拔进入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并完成预科阶段培养。哥哥程梓峻通过高考统招被数理类录取，并报名了丘成桐数学领军计划的校内二次选拔环节。

### 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一流人才方阵，厚植人才发展土壤，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需要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建强教师队伍、加大经费投入、搭建成长平台均是必须之举。”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加大对基础学科人才的支持力度，长江学者、教学名师等人才计划向基础学科倾斜，集聚一批德才兼备、热爱教育、造诣深厚的大先生投身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同时，建立国家、地方、学校、社会多元投入机制，优化经费支出结构，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研究提高基础学科生均拨款标准，加大优秀学生资助力度。同时，教育部还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推动建设基础学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为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接触前沿领域提供平台，构筑产学研融合的创新生态和育人生态。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自主培养的顶尖人才不断涌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总师均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实践证明，中国教育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能力培养出大师来。”该负责人强调。（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0月4日）

## 北京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支持高校创建二十二家高精尖创新中心

朱竞若 王昊男

首都北京集聚了近百所高校、1000多家科研院所、2万多家高新企业，人才资源极为密集。近年来，北京紧紧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深化战略科技人才放权改革，推出深化改革举措。北京从提供稳定经费、精简科研管理、加强包容保护等方面出台25项改革举措，建立“充分信任、充分放手、充分依靠、充分保护”的人才发展机制；出台地方法规，明确科技成果产权科技人员可以个人拥有，着力实现有的转、有权转、愿意转、转得顺；针对大师级人才缺乏问题，实施“北京学者”培养计划，现已选拔培养56名“北京学者”和35名“青年北京学者”；支持高校创建22家高精尖创新中心，累计投入经费58亿元，并要求不低于70%的经费用于人才，实施以来共培养集聚芯片、基因诊断、生物医学、智能机器人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创新人才5735人。

赋予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权，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等一批由战略

科技人才领衔的新型研发机构先后成立。

实施人才出入境便利化改革，用好先行先试优势。发挥中关村全国首个国家级人才特区先行先试优势，建立部市合作机制，实施国际人才出入境新政。其中，允许外籍人才境外直接申办中国“绿卡”等政策为全国首创。新政实施以来，已为 26 名外籍人才办理了在华永久居留。优化外籍人才来京就业审批办事流程，将办理时限压缩至 10 个工作日。

不断优化人才服务体系，各方协力排忧解难。建设外籍人才服务工作网络，优化“落地即办、未落先办、全程代办”外籍人才服务体系。实施重点企业“人才服务包”制度，为全市近 400 家“服务包”单位制定“一对一”支持举措，在引进落户、办理工作居住证、应届毕业生接收等方面提供保障。结合区域发展和人才工作实际，先后确定朝阳望京、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新首钢、通州、顺义、怀柔科学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8 个人才社区。两年时间，共推动 1.1 万套国际人才公寓、23 所国际学校、8 家国际医院、18 个外国人服务站点建设，国际人才在京工作生活条件不断提升。（来源：《人民日报》2021 年 10 月 3 日）

## 清华压缩文科博士规模引发热议

近日，一则“清华大学将压缩文科博士生规模”的消息在人文社科学术界引发热议。这一说法出自 9 月 17 日召开的清华大学文科工作会议，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谈及未来学校文科建设工作要求时，提出文科发展“控规模”。这是历次文科工作会议中，清华首次提出要控制学科规模、控制博士生规模。

据了解，邱勇在会上提出了文科发展的十点要求，其中有三点均提及“控规要控制学科规模，率先建立内部结构调整机制”；“要压缩博士生规模，提高培养质量”；在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方面，再度强调“要严格控制规模，不断提高质量”。

### “控规”的背景

文科发展控规，与清华“十四五”时期学科建设规划有关。针对学校、各院系的“十四五”规划及存在的问题，邱勇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清华文科发展要有新的目标与定位，要突出目标导向。要自信从容，实现文科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最能够代表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观念、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文科。要长远规划、统筹考虑，以十年为期推进相应工作部署，到 2030 年实现清华文科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授张雷生认为，“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思路，深刻反映出当前国内高校学科建设正逐渐回归理性，正在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追求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学科建设模式转换，是在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新时代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扎实举措”。

**清华不重视文科了吗？**

事实上近些年来，清华大学高度重视文科建设。2017年，清华大学制定《关于加快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推进文科建设“双高”计划的实施意见》。2019年起，学校决定每年召开一次文科工作会议，专题研讨文科建设问题。

过去五年，清华文科发展迅速，国内外影响不断提升。邱勇说，正是因为清华文科的发展，清华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文科发展为学校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与通识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文科发展让清华变得更人文，更人文的清华也让清华更创新、更国际。

### “文科无用”的争论

清华大学“控制博士生规模”引发舆论关注的背后，是长久以来对“文科无用”“文科泛滥”的争论。

事实上，国外顶尖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十分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作为本科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哈佛大学推出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就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领域，强调培养“有效的思考、交流思想、作出恰当判断以及辨别价值”这四种能力。以理工科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为学生开设了丰富的人文学科专业课程，近些年在强调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人文学科的发展已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认为，现在无疑是文理交叉以及跨学科发展与融合的时代。多年来，高校在文理交叉中，早已形成了诸多新型学科，这些学科实际上很难分文理。时代的发展催生科技创新、社会创新，就是要打破高校学科与专业间的界限与藩篱，这一点毋庸置疑。

## 习近平提到的“战略科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钟 祺 山 秋

人们常称呼钱学森、王大珩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大科学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在学术界，他们还有一个更专业的称谓——战略科学家。

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要求“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什么是战略科学家？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一个故事讲起。

2009年底，一位科学家冒着大雪从英国剑桥飞回中国。当时，国内“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刚启动，作为国际知名地球物理学家，他立即被委以重任，开启深地探测关键装备攻关研究。

地球物理学是介于物理学、化学和地质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深地探测又涉及舰船、汽车、计算机、新材料等诸多技术。周期长、环节多、领域广，科研攻关难度可见一斑。怎样合理调配各方资源，让有限的投入发挥最大效用？

这位科学家当上了“舵手”。他跳出学科的门户之见，站在国家层面思考问题，撬动一切资源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他的协调指挥下，全国各地 1600 多名科学家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朝着相同目标一起努力。受到他的感召，一大批海外科研专家也纷纷回国加入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

曾有记者问：中国深地探测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差距？他回答：人家是“导弹部队”，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其中一些“步枪”还是通过进口获得，高精尖的装备被别人禁运。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用 5 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 20 多年的路程”，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有外媒评价称：他的回国，让某国整个航母演习舰队后退 100 海里。

他就是黄大年，被称作“当今中国不可多得战略科学家”。

如今，像地球物理学一样，许多科研领域呈现出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势头。无论是科学家队伍的组织还是科研项目的管理，都呈现新特点、面临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谁能在科研战场上指挥不同兵种的大作战？显然非战略科学家莫属。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这样定义“战略科学家”：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

可见，战略科学家首先是科学家，是在科研战场上一步步打拼出来的佼佼者。但与一般科学家不同，他们既能深入专业探幽微，又能把握国家战略需求，而且善于组织大规模科研攻关。因此，战略科学家把得住方向、做得了科研、带得了队伍，是科学家里的“帅才”。

值得一提的是，战略科学家是坚定的爱国者。比如，邓稼先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黄大年在毕业留念册上写道：“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这正应了那句话：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纵观钱学森、朱光亚、李四光等著名的战略科学家，都是在关键领域科技创新面临重大挑战时，既能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也能前瞻布局科技创新体系的领军人物。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在接受小组采访时说，战略科学家是一种角色，并非特指具体的个人，要更多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来把握这一概念。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放在科研领域同样适用。

目前来看，中国科研队伍数量庞大，但有专家缺大师，战略科学家远远不够。对此，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对于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习近平特别提到“坚持实践标准”。的确，正确决策的制定往往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之上。作为战略科学家，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要亲自下现场、搞调查，解决实际问题。

怎样让更多战略科学家“冒”出来呢？石谦认为，不仅要在已有高端人才堆里选拔，还要将培育战略科学家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人才身上，支持更多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研究表明，30—40岁是科学研究的活跃期和创新能力的激发期，是战略科技人才发展的关键阶段。石谦告诉小组，“两弹一星”元勋大多在“黄金年龄”就在重要岗位担任职务。比如，邓稼先35岁参加主持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王大珩37岁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并担任馆长。

欲治兵者，必先选将。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能否冲破条条框框，拓宽人才发现识别途径？怎样让科技人才广泛参与到科技战略决策中？如何营造有利于科学家潜心研究的社会环境？等等。

这些都涉及整体的科研体制改革。把体制机制理顺了，越来越多的战略科学家才会从科学家群体中脱颖而出。（来源：微信公号“学习小组”2021年10月11日）

## 【高教快讯】

## 9月-10月高教快讯汇编

近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公布了2021年“优质本科课程”和“优质本科教材课件”遴选结果，共计229门课程和226部教材或课件上榜。

9月16日，南开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签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的建设机遇，充分发挥学科交叉互、科研水平领先、综合实力雄厚的优势，在人才培养、学术活动、科研合、成果转化、资源共享、区域协同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9月17日，“一带一路”财经类大学联盟成立。该联盟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倡议发起，创始成员包括来自中国、奥地利、保加利亚、葡萄牙、希腊、俄罗斯、突尼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墨西哥、格鲁吉亚等国的20所大学。联盟将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前瞻性、关键性理论研究，提升财经类院校的国际影响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服务。

9月22日，清华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研究院为校级实体科研机构，院长由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担任。该研究院将创新理念和机制，努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新格局的新型战略平台；围绕碳中和打造技术创新中心、高端智库战略中心、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合作交流传播平台。据悉，9月18日，清华大学与中核集团、华能集团等签约共建高温气冷堆碳中和氢产业技术联盟，打造工业规模示范项目，努力实现相关行业的二氧化碳极低排放。

9月22日，浙江大学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战略互信，聚焦家需求，发挥叠加优势，推进高能级平台建设，深化高层次人才引育，着力打造校企合作的新范本。

9月27日-28日，第七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天津举办，由清华大学承办的“大学形象国际传播”分论坛同期举行。18所大学50余名专家学者和高校国际传播相关工作负责人共同发起《加强大学国际传播工作天津倡议》，呼吁中国大学共商合作、共建平台、共享经验，助力中国高等教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思想、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大学的智慧和力量。

9月30日，北京大学宣布成立兰园书院。兰园书院将立足北大学科优势，打造卓越的交流平台，拓展广阔的国际视野，通过讲座、论坛、实践活动等形式，启发女性更好地自我发现、自我实现。据悉，兰园书院首任院长由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教授、美国医学科学院外

籍院士柯杨担任。

近日，在建校 125 周年之际，四川大学获得众多知名企业和杰出校友捐赠共计 4 亿元。该笔捐赠将用于支持学校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助力四川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10 月 12 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发布了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奖励决定，共评选出全国优秀教材 999 种、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 99 个、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200 名。获奖的高等教育类优秀教材共计 399 种，其中特等奖 4 种、一等奖 80 种、二等奖 315 种，覆盖了高等教育所有学科门类、76 个本科专业类。

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公布首批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名单，全国共确定 10 家综合基地和 82 家特色基地，其中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 14 所高校入选。

10 月 9 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强调了“十四五”期间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主要措施包括：继续办好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好金课，把乡村振兴作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一堂最有温度的思政课；建好体系，在示范基地、示范高校基础上，还将推出一批国家级双创学院，打造一批国家级双创实践教育中心，充实创新创业人才库和导师库，把“国创计划”深入开展下去，使创新创业教育成为一个全覆盖、多层次、个性化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10 月 15 日，第三届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和创新创业英才奖颁奖典礼在南昌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林毅夫等 19 位师生获奖。“教学三大奖”是由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组织、深圳市陈一丹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资设立的，于 2019 年启动，每年评选一次，是目前高等教育教学领域奖励力度最大的奖项。

近日，南开大学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南开大学框架合作协议》，该协议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与国内高校签署的首个高级别全面框架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产业政策研究与咨询、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以及国际组织及技术领域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展开框架合作。

10 月 10 日，华东师范大学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教育数字化转型，双方将共同探索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在线教学、教育信息化、智慧校园建设、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深化人才联合培养，特别是探索社会急需的师范类人才的新型培养模式；牵头成立全国教育数字化改革学校联盟。

10 月 12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迎来建校七十周年华诞之际，学校获多笔捐赠：紫江集团捐资 1 亿元，设立专项建设基金，支持华东师范大学开展基础配套设施、科研课题支持、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智库建设等工作，其中特别提到将全面支撑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建设集文献搜集整理、研究、资政和培训于一体的跨学科高水平学术平台和高端智库；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杰出校友、美的集团董事长兼 CEO 方洪波先生个人捐赠 6000 万元，设立“上善基金”助力学校一流大学建设。

10月1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与西北工业大学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共建产业创新平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联合开展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

10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呼和浩特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实现上海交通大学在人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资源与内蒙古的重点产业更好的结合，推动形成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拉动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上海交通大学呼和浩特科技创新中心也于同日成立。

10月12日，复旦大学与上海市信访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成立上海市信访与社会治理研究基地。双方将依托研究基地，开展理论研究、政策研究、经验提炼、人才培养等合作。

近日，多所高校纷纷成立“双碳”研究机构。9月30日，天津商业大学“双碳”研究院和东南大学长三角碳中和战略发展（苏州）研究院同日成立。10月9日，中央民族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

9月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的研究”课题组发布2021年“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教育质量“百优榜”。该榜单由中国高等教育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原校长陈骏教授领衔，协同十余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南大教育研究院、南大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价中心共同参与发布。根据榜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位居前3，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分列第4至第10位。

10月13日，《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正式印发实施，《规划》中提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整合优势资源，重点支持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动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6所高水平大学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范围，支持高校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建设。《规划》还提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稳步推进中外、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

近日，《福建省“十四五”教育发展专项规划》出台，提出到2025年福建省要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并明确了15个主要发展指标。《规划》提出谋划建设1至2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增设医学、工科、海洋等急需紧缺科类本科高校；围绕集成电路等领域建设10个左右高水平学科创新平台；在研究生教育扩容提质方面，将加大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培育力度，力争“十四五”期间，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增长20%左右、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实现各设区市全覆盖。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宣布将成立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研究（Sustainable and Green Finance Institute, SGFIN），以推动绿色金融教育和研究。据悉，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研究所着眼于亚洲，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提供思想指导，并形成可持续发展成果和决策。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研究所计划从世界各地招聘研究人才，开展学术和应用研究，提供相关的金融解决方案和框架，以应对世界特别是当地面临的紧迫气候和社会挑战。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研究所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支持，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面投入运营。

近日,伯明翰大学宣布与西门子公司合作,将大学的爱居巴斯顿(Edgbaston)和迪拜(Dubai)两个校区改造成为全球最智能的大学城。该项目计划利用数字传感器和分析技术、人工智能、分散能源生产和存储、可再生能源和有助于改变用户行为的概念相结合,使其研究、教学和学习都能从获取新数据和连接中获益。据悉,2021年伯明翰大学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所大规模推广物联网(IoT)技术的大学。

近日,牛津大学宣布成立贝内特应用数据科学研究所,旨在率先在医疗保健和政策中更好地使用数据、证据和数字工具,优化干预政策的影响,以取得更好的成果。据悉,贝内特研究所将汇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包括临床医生、软件工程师、政策专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将开发和实施新的方法和工具,使数据和论证更具影响力。

9月28日,斯坦福大学网站发布消息,宣布将收购位于美国加州贝尔蒙特(Belmont)的那慕尔圣母大学(Notre Dame de Namur University, NDNu)。这将为斯坦福大学提供更多的办学空间,并为陷入困境的那慕尔圣母大学提供财务支持。根据两所大学签署的协议,斯坦福大学将在2025年6月前拥有购买该物业的专有权,而那慕尔圣母大学将收到一笔押金以确保其近期的发展。两所大学仍将是独立运营的机构,学生将通过各自的大学获得学位。

10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在上海成立。经过4年的规划建设,该中心正式落成、投入运行,将为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服务人类教育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据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将奉行“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宗旨为全球教师教育服务,特别是为亚太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师资能力建设提供服务与支持。

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网站公布2022年度第24届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名单。其中,浙江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教授、执行主任胡海岚因在神经科学(尤其是抑郁症)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奖。公告称,她的工作促进了新一代抗抑郁药物的研发。

近日,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表示,俄罗斯将实施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校园”项目,在全国建设30个顶级大学校园,其目的是提高高等教育的品质,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该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将投资360亿卢布,建造至少30个可容纳超过15万人的校区。校园的一大亮点在于营造现代化的多功能空间,以满足学生学习、科研、生活等多方面需求,激发创造力和研究热情。

印度商务部上月宣布,对在印度申请专利的国内外教育机构减收80%的管理费,以鼓励更多的产业与大学合作,使其在专利创新研究的发展方面具有全球竞争力。据印度教育部通知,这项减免的费用,包括保护专利和在侵权情况下起诉的费用,将适用于所有公认的教育机构,包括政府所有、资助和私人教育机构,并将该范围向世界各地开放。根据印度议会7月份发表的一份关于印度知识产权制度的报告,在印度申请的专利中,约有三分之二是由非印度居民或外国实体申请。该政策的实施,预计将促进符合条件的机构的创新和更多专利的申请。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机构IDP Connect基于55个国家的3650名学生的一项全球调查表明: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扩大在线学习并没有减少在外国线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学生

仍将海外学习视为长期移民和额外学习的潜在手段。调查显示，79%的受访者希望到国外线下学习，65%的受访者有兴趣在毕业后获得留学国家的工作权利。

10月11日，香港理工大学宣布与多所世界知名研究机构联手在香港科技园设立三个世界级的研究中心，分别为：人工智能设计实验室 (AiDLab)、可靠性和安全进步中心 (CAiRS)、眼睛和视觉研究中心 (CEVR)。这三个研究中心均基于香港的两个创新平台——AIR@InnoHK（专注于发展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技术）及 Health@InnoHK（聚焦于医疗相关科技）而设立，目的是汇聚世界各地的顶尖研究人员，在香港进行具影响力的科研合作。据悉，理大亦成为“中国科学院香港科学与创新研究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心”的首个本地合作机构。该中心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CAS) 建立的，理大和中国科学院将在现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在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前沿研究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合作和学术交流活动。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 2021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公布

10月25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1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排名榜单包括 96 个一级学科，各个学科排名的对象是在该一级学科设有学术型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所有高校，发布的是在该学科排名前 50% 的高校。共有 486 所高校的 4992 个学科点上榜。

据悉，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源自服务于高校学科建设管理部门的学科发展水平数据监测平台。指标体系包括人才培养、科研项目、成果获奖、学术论文、学术人才 5 个指标类别，下设 17 个指标维度，共计 50 余项反映学科竞争力的客观量化指标，涉及百余项观测变量。排名数据全部来自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和国内文献数据库等第三方。

此次，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指标体系进一步优化，特别是着重解决了人才评价的“唯帽子”问题。在 2021 年排名中，“学术人才”类别下资深学术权威、中年领军专家、青年拔尖英才、文科学术骨干等各个维度的人才统计不再局限于人才称号获得者，把重大项目的承担者、重大成果的完成人等专家学者同样纳入人才统计，以实际贡献作为人才标准。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2021		指标体系		
<b>人才培养</b> 立德树人典型 模范先进教师 模范先进学生 精品课程教材 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中宣部组编马工程教材 教育部组编马工程教材 教学成果奖励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研究生教育成果奖 造就学术人才 科学院士 工程院院士 长江特聘 国家杰青 科技领军 哲社领军 工程领军	<b>科研项目</b> 重大重点项目 重点研发计划 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仪器研制 自科重大项目 自科重点项目 社科重大项目 哲社攻关项目 社科重点项目 面上青年项目 自科面上项目 自科青年项目 社科一般项目 社科青年项目	<b>成果获奖</b> 国家科技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 (仅用于理、工、农、医门类学科) 教育部奖励 教育部人文社科奖 教育部科学技术奖 (仅用于理、工、农、医门类学科、 交叉学科)	<b>学术论文</b> 国际重要期刊论文 (理、工、农、医门类学科增加 信、文科学科权重调整) 中文期刊论文 (仅用于文科学科、艺术门类学科、 交叉学科) 国际顶尖期刊论文 (仅用于理学、医学门类学科和 交叉学科) 中文顶尖期刊论文 (仅用于文科学科和交叉学科)	<b>学术人才</b> 资深学术权威 科学院士 工程院院士 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重大项目主持人 重大权威奖项获奖人 (仅用于理、工、农、医门类学科) 中年领军专家 长江特聘 国家杰青 科技领军 哲社领军 工程领军 重点项目主持人 权威奖项获奖人 青年拔尖英才 国家优青 海外青年 青年拔尖 青年长江 青年权威奖项获奖人
		<b>国际知名学者</b> 科睿唯安高被引 爱思唯尔高被引 (仅用于理、工、农、医门类学科和交叉学科)	<b>文科学术骨干</b> 文科重大项目主持人 文科权威奖项获奖人 (仅用于文科学科和交叉学科)	

**【学术探讨】****构建全方位培养体系 培养心怀“国之大事”的拔尖人才**

阎 琨

学生和教师是高校人才工作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总书记还指出，要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要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本版从学生和教师的视角对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进行了阐发，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拔尖人才是人类智慧和能力的集大成者，有必要为其建立一个科学规范的选拔与培养体系。我国目前的拔尖人才培养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应当是我国高等学校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探索方向。本文立足我国拔尖人才培养实践，并结合国际主流理论，为我国拔尖人才选拔、培养和评价提供以下路径和方法。

**培养心怀“国之大事”的拔尖人才**

拔尖人才反映社会所重视和希望培养的理想行为和潜力。能否成为“国之重器”，肩负更多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是对拔尖人才的时代要求，也是众多国家从顶层设计角度部署拔尖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驱动力。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背景下，未来的拔尖人才除了具备超常禀赋和能力外，还应怀有为国家需求和社会服务的初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致力于人类发展重大命题，并愿意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福祉而奋斗的情怀。

目前我国对于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从政策导向、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有待提高。

从政策层面而言，我国近年来虽然出台多项拔尖人才专项政策，旨在构筑促进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专门通道，集中培养一大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但在“强基计划”出台之前，这些政策多聚焦于学术英才的选拔和培养，缺乏对国家和社会责任感的系统性关注。

在理论层面，对拔尖人才的国家和社会责任感内涵与外延的研究缺乏，对其学理认识更是存在明显不足。在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仍然聚焦于传统的智力表征，重视拔尖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训练，而对人格养成教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缺乏应有关注。

在实践层面尤其是在评价上，短期绩效导向驱动下的拔尖项目过多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科研成果等显性指标，对拔尖个体社会责任感和贡献力等内隐性要素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

有鉴于此，我们应将国家贡献力和社会责任感要素贯穿于拔尖人才教育的全过程中，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心怀“国之大者”的拔尖人才，将对能力培养和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的双重人格塑造纳入选拔—培养—评价的每一个环节中。拔尖人才培养要强化使命驱动，强调拔尖人才的身份“不是光环，而是使命；不是荣誉，而是责任”。引导拔尖人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人类未来发展，应对人类未来重大挑战，树立破解人类发展难题的远大志向。

### 在拔尖人才选拔和培养中关注实践智能

当前我国拔尖人才的选拔标准主要偏重于学生的学业测试和竞赛成绩的智商考量，在选拔中缺乏对拔尖学生的心智结构、志趣等个体因素的整体考量。但单一的智商测试之信效度在国际拔尖人才学界已经日趋受到质疑，且智商对拔尖人才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阈值。相较于传统的“天赋智商”，关注个体的“实践智能”对拔尖人才的选拔更有实践意义。

因此，一方面，我国高等学校拔尖人才项目的选拔核心应该考察在学习者的特长、偏好、志趣和学科知识之间，心智结构与学科的深层文化结构之间，有无选择的默契感和亲和感。另一方面，对实践智能的考量也非常重要。拔尖人才选拔时，也应侧重于考查学生在实际情境中运用知识和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在他们感兴趣或表现出特长的智能领域，合理规划达成目标的路径并将其成功实现的能力倾向。

对于如何培养实践智能，斯腾伯格指出，在学校课程中融入自我管理、任务管理和与他人合作三方面内容至关重要，其中自我管理包括引导拔尖学生认识多元智能，积极探索自我，展示和应用知识；任务管理包括认识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寻求解决问题的帮助以及时间管理；与他人合作包括如何展现自我，如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以及如何从长远的角度对待他人。建立科学规范拔尖人才选拔体系是我国拔尖人才战略顶层设计的第一步，这个体系中既有定量的专业、学术和智商考察，也应该有定性地对拔尖学生实践智能的考量。

### 为拔尖人才提供异质化课程

拔尖人才内部存在巨大的异质性，每个拔尖学生在智力能力、心智结构和发展需求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目前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方式主要采用的是以专业为导向，按照既定的目标，使用统一的课程内容、教学材料和考核方式来培养。这种同质性课程，把各式各样的拔尖学生框限于其中，既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研究志趣，也阻断或者限制了学生拓展其他研究领域的发展可能。

为拔尖人才提供异质性课程是国际上改革的大势所趋，已在国际拔尖人才学界达成共识。我国高等学校也应该顺应国际趋势，转变拔尖人才培养理念，从现有以专业为中心的组织模式走向专业需求和拔尖学生个体需求相结合的育人模式。从学生个体需求出发，充分评估每个拔尖学生的认知能力水平和发展取向、非认知个体特征及其所处的环境特点，为他们提供适合自身特点的多样化课程。在配套的制度建设上，构建本研一体化的课程体系，搭建跨学科平台，为拔尖人才自主选择拓宽和加深现有知识体系提供途径。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拔尖人才课程培养体系应当是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探索方向。

### 为拔尖人才建立动态的发展路径

我国目前的拔尖人才项目在教育供给层面，如项目规划、课程教学、教材选择、师资培养等方面，缺乏系统设计和理论规划。根据天资发展理论，拔尖人才是个体与环境互动发展的结果，应该为拔尖人才提供一套与其发展相匹配的培养路径。学者茨格勒指出，在特定领域的卓越表现不在于个体，而是由个体及其环境构成相辅相成的生态系统；系统中每个组成元素是有机融合的整体。拔尖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持续互动为特征的支持系统，因此高等学校中的培养项目应该根据拔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风格，并结合拔尖人才培养理论，对包括学习的目标和计划、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甚至教学场所在内的学习环境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构建一条适合拔尖人才成长的发展路径。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路径本身是动态发展的，拔尖学生通过与学习环境的互动来提升他们的行为技能库。随着学习者专业水平的持续提升，行为库的不断扩大，外界环境也应该越来越专业，更适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此外，拔尖人才项目应该追踪每个拔尖学生的学习进展。在这整个过程中，教育者及时有效的指导和反馈至关重要。

### 平衡好社会价值导向和个体发展需求

目前高等学校开展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致力于将先天禀赋拔尖的学生培养成为能够在基础学科和尖端领域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顶尖人才。这些项目大多以拔尖学生外在的成绩和成就而非内在的成长来评判学生的价值，他们的社会心理以及职业发展需求有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此外，一些拔尖项目在选拔人才时忽略对项目目标的清晰阐述，往往造成项目目标与学生个体目标之间的匹配错位，在挫伤拔尖人才参与项目积极性的同时，导致天赋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割裂。

如何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平衡好社会价值导向和个体发展需求，应是我国拔尖项目关注的重点。一方面，在拔尖人才选拔环节，向候选人阐明项目目标，并将学生的非认知个性特征和旨趣志趣等因素纳入考察；另一方面，在培养过程中，拔尖培养项目应该评估每个学生的发展取向，并将其纳入个人的培养方案制定之中。此外，在拔尖项目中，为学生提供职业咨询，定期对拔尖学生进行发展路径和职业规划诊断，及时了解拔尖学生的心理动态和发展需求，帮助他们优化心理生态，并与其共同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从而实现整合外部设定目标和个体发展目标的结果。

### 拔尖人才的评价应超越具体的学科领域

我国的拔尖人才项目以学科为区分标准，具有鲜明的学科界限，目标是培养特定学科领域的卓越人才，也即领域专才。我国高等学校的一些拔尖人才培养实践还没有完全指向“通专结合”的培养目标。而国际拔尖人才培养趋势已经从领域专属逐渐走向领域通用与领域专属并重。即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更加多元；另一方面在专业能力之外，对领域共同价值和规范的体认、团队合作能力、管理协调能力等通用能力，以及批判力、思考力等思维能力对拔尖人才最终走向卓越有重要影响。

因此，高等学校在拔尖人才培养上，除了使用模块化课程加强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外，要通过搭建跨学科平台，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拔尖学生之间的融合。在评价上，在领域专业能力评估之外，加强对拔尖学生通用能力的评估。

### 建立全方位的拔尖人才培养和研究体系

我国教育界对拔尖人才研究尚处在初期探索阶段，与国际拔尖人才研究学界的理论模型、方法论以及前沿研究还没有形成充分交流和对接。学界对什么是拔尖人才，拔尖人才如何选拔，如何培养，如何评价等基本问题还需要达成共识，对如何培养中国特色的拔尖人才也需要与国际经验进行研讨和对话。

当前，国际拔尖人才研究学界已转向对立体多维的拔尖人才培养生态系统的研究。我国也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立德树人和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理念，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教育界要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历史使命，把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堪当大任的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要鼓励研究者充分与国际前沿范式和研究方法交流、对话，相互借鉴，积极探索扎根中国大地的、适用于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用全方位、多角度、先进科学的路径培养一大批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拔尖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作出贡献。（阎珉，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聘副教授，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6日）

## 未来课堂如何求“变”？

黄荣怀

### 一、从班级教学到未来课堂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课堂教育经历了班级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和技术与教学融合四次变革。

那么，现阶段课堂教学该如何进行，未来课堂将如何发展？或许可以从对课堂教学的现实需求入手，来解答这一问题。

#### 首先是智慧学习环境需求。

这一环境应在各方面对未来课堂形成支撑，在条件上能够容纳各种新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MR等；在场景上，强调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任意方式和任意步调的学习，这种泛在学习的方式不仅局限于学校的学习，还涉及社会学习和终身学习，其特征是面向不同的学习者，目标是让所有人轻松、投入、有效地学习。

#### 其次是学习体验提升需求。

教育信息化发展至今，已由过去的“三通两平台”步入教育信息化2.0阶段，就教室环境而言，增添了许多设备，包括网络、投影仪、电视等，但目前无论高校还是中小学生的课堂

体验仍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如何在改善装备和布局等教学环境的基础上，融合技术改进教学方法，为师生提供服务，以提升师生体验也是未来课堂需要解决的问题。

### 最后是新的人才培养的需求。

21 世纪人才的培养目标相较过去已发生很大变化，仅靠书本上的知识已不足以应对这些变化。21 世纪人才所需具备的核心技能有三点：

一是学习与创新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和创新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

二是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包括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信息交流和科技素养；

三是生活与职业技能，包括灵活性和适应性、生动性和自我指导、社会和跨文化技能、高效工作和胜任工作的能力、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等。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提出要“实现教育现代化，加快信息时代教育变革”，未来课堂该如何以“变”应“变”以解决上述需求？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很具体地定义未来课堂，但其发展方向已逐渐清晰，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智慧教室、真实学习和有效教学。

## 二、智慧教室如何变化？

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是在教室内开展师生的教与学，是教学空间和教学法的集合。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参与教学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教学辅助技术成为新时代智慧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教学法与教学空间共同组成智慧教室的铁三角。技术与教学融合下的学习空间研究成为当今国际智慧教室研究的重要领域。

美国北卡罗纳州立大学本科学生中心化活动项目（SCALE-UP）认为，学习环境的优化能改进学生的态度、课堂参与率和学生解决问题的技能；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强化主动学习”教室 TEAL 项目认为，相对传统的教室环境，在智慧教室中学生的概念理解力增强、失败率降低；明尼苏达大学的“主动学习教室”项目提出：空间塑造教师行为、学生行为和教室活动，教师行为和教室活动塑造学生任务行为。

比如，当进入餐馆、图书馆、咖啡馆时，我们的行为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以融入不同的环境，这种行为改变约定俗成且不需要解释。在智能技术应用的智慧课堂中，教师、学生行为和教室活动也应如此。

那么，智慧教室是什么？该如何变化？智慧教室的“智慧性”涉及教学内容的优化呈现、学习资源的便利性获取、课堂教学的深入互动、情境感知与检测、教室布局与电器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可概括为“SMART”概念模型，分别为：

1. 内容呈现 (Showing)，主要包括视觉和听觉两方面，不仅要求内容的呈现方式适合学习者的认知特点，更要有利于增强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理解和加工。

2. 环境布局 (Managing)，主要表现在智慧教室布局的多样性及管理的便利性，智慧教室内的所有设备、系统、资源都应具备较强的客观理性，包括教室布局管理、设备管理、物理

环境管理、电气安全管理及网络管理。

3. 网络及资源接入 (Accessing)，主要表现在智慧教室中资源的获取能力和设备接入的便利程度，涉及资源选择、内容分布和访问速度三方面。

4. 及时互动 (Realtime Interacting)，主要表现在智慧教室支持教学互动及人机互动的能力，涉及便利操作、流畅互动和互动跟踪三个方面。

5. 情境感知 (Testing and Sensing)，主要表现在智慧教室对物理环境和学习行为的感知能力，将教室内的声、光、温、气调节到适宜学生身心健康的状态，根据所获取的学习者的位置、姿势、操作、情感等方面的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适应性支持。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成熟与应用，以上五个方面将成为智慧教室的创新方向。不同于过去仅仅停留于装备、资源建设和系统集成，今后智慧校园建设应综合各个方向，进行大规模的顶层设计。

### 三、真实学习如何考量？

传统教学属于对知识的精加工，侧重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学习路径是单一的、顺序的、同构的，以低阶认知目标（识记、理解、应用）为主，学习内容主要来自书本的良构知识，学习方式以传统知识的讲授为主，按顺序逐一“消化”知识点。

而未来课堂中的真实学习是知识融通型学习，渗透更多的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以多样的、非线性的、异构的学习目标为学习路径，关注高阶认知目标（分析、综合、创建），大量增加来自生活的非良构知识，以学习活动组织为主，强化对学习的支持和服务，侧重知识关系的梳理和小组协同的知识建构。传统教学向未来课堂的过渡是知识的浅层学习向知识的结构变化及迁移的深层学习的转化，是未来学习的发展方向。

真实学习包含四个要素，一是活动聚焦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情景；二是运用思维技能和元认知进行开放式探究的深度探究；三是学生参与到学习共同体的对话和社会学习中的学习；四是学习者通过获得赋权指导自己学习的自我选择。

它强调的是学习过程与问题解决之间的同频共振，是需要学生对现实世界中的有关问题和项目情境进行研究探究、讨论有意义的建构概念和关系的教学方法。

以此聚焦现实的复杂问题和解决方法，将真实学习与现实生活强关联，以多重来源和多维视角的跨学科视域，采用角色扮演、基于问题的活动、案例研究以及参与虚拟实践社群等方法，通过师生间的协作，在学习过程中加入反思和综合评估，对事物提出多重解释，产出精致作品。

### 四、有效教学如何设计？

传统教学的讲授形式是教师对教辅教材、书本中的知识点分单元进行顺序讲解，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的逐步提升，继续按照过去的每一节课内容精心备课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在混合式学习的教学组织框架下对整体教材和课程从教材分析、课程计划、活动设计、资源准备、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合理安排。

未来课堂的教学设计强调大概念、主题式、融合化、实践性。以高校课堂为例，未来进

行有效教学需要具备五个关键要素，分别为清晰授课、教学方法多样化、任务导向、引导学生投入学习、确保学生成功率。

其面对真实学习的设计理念包括：

一是采用多样化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国际主流学习方法，以适应“数字一代”学习需要。

二是将社交网络和电子教材应用于学习中，为学习者提供技术丰富的学习环境。

三是实施混合式学习策略，让学生体验云存储、在线学习平台及即时通讯工具等先进学习技术。

四是将即时评价工具、小组互评和教师点评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充分体现课程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

五是高度关注学习者体验，实时调整教学策略，切实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人类学习作为一种高级的心理活动，具有复杂性、动态变化的特点。对于有意志、有情感、有独立个体的学生，在教学中我们该采用何种学习激励方式打通从学习投入到学习产出之间的黑盒子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关键。

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也不乏充斥着消极的情绪，对分数的畸形追求、与学生为敌的考试、不合理的学习负担；在教学理论、教学实践、学习技术领域存在自说自话的嫌疑，导致教育理论“中看不中用”，教育实践“经验主义”，以及技术应用呈现“从人灌到机灌”的现象等。

尽管当前的教学改革仍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单就目前的技术与教学相融合的信息化课堂来看，我们不妨尝试分析信息化课堂中所包含的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在内的教学行为，并由学校、家庭、社会组成的关系模型形成评价以规范教学行为。信息化课堂的教学行为评价指标：

一是强调双边互动。在信息化课堂中，为了达到预设的教学目标，教育者和学习者借助信息技术、教学教育资源、教与学方法进行的一种双边活动。

二是教师层面。关注教师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运用技术手段在课堂教学中实施内容展示、师生互动、课堂导学、学习促进、活动组织、资源获取等行为。

三是学生层面。关注学生在信息化教学中所使用到的技术工具按照运用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探究技术、沟通技术、建构技术、表达技术、管理技术和综合类技术。

在新的教学革命中，应通过构建新的教学生态让学校的教学行为和理论之间形成闭环。目前看来，我们可能过多地期待或高估了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即时作用，希望其马上出成绩。

技术与教育的融合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需要在教育的长期实践中去融合、发展与完善，今后应更多地探索新技术的长期效益，放眼未来 10 年、20 年，甚至 50 年之后，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成果。

（黄荣怀，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来源：中国教育智库网 2021 年 9 月 25 日）

## 新文科人才培养何以实现?

公钦正 张海生

### 一、问题提出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统称,人文学科是研究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科学,关注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包括人的精神、价值、观念和情感;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科学,关注的是人与他者的关系,包括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就在于以人为中心,考察人本身的理性、思想,以及人际关系、社会属性,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党的十九大以来,新时代、新形势、新使命呼唤高等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新文科”建设亦责无旁贷地肩负着回应时代需求的历史使命和重任。

但新文科绝不是对传统文科的简单否定与彻底抛弃,而是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应对传统文科发展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自我革新与历史转向。我国新文科建设启动于2019年4月,在教育部发布《“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后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对新文科建设的理论内涵、建设意义与实践路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对学科交叉融合、文科专业建设、人文与科技的关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等新文科建设的主要议题分别作了分析。然而,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宏观和中观的理论分析和逻辑层面,真正具体到操作层面、微观层面(如人才培养、课程设计、教学改革与评估)的研究却十分鲜见。因此,当下深入探讨新文科人才培养问题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本文将以太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简称PPE)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尝试从技术操作层面上探究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共性特征、逻辑转向和实践路径。

### 二、研究设计

#### (一)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作为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跨学科专业,PPE能够为新文科建设提供极具意义的思路和视角。1920年10月,为了回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保守主义人才培养模式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满足大英帝国在本土和殖民地的高级学术与管理人才的需求,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率先开设了由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三个学科(被称为“Morden Greats”)共同构成的新型本科专业,即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PPE的设立使三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知识、方法、理论、实践真正融为一体,在推动学科交叉融合、解决时代重大挑战、培养高素质领导型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迄今为止,从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的学生包括4位英国国王,8位其他国家国王,最近11任英国首相里的6位等,

堪称全世界人文科学类水平最高的专业，受到全球大学的争相效仿。时至今日，欧美大部分顶尖大学均已开设 PPE 专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学还开设了诸如政治、哲学和法学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Law, PPL)，伦理、政治和经济 (ethic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EPE) 等衍生性专业。可以说，牛津大学的 PPE 开创了一条传统文科通过交叉融合实现自我革新的创新发展之路，使传统文科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能够体现新文科建设的趋势。

本研究以牛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 PPE 专业作为新文科人才培养的研究案例，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两所大学 PPE 专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作为创始学校，牛津大学开设的 PPE 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具有最初始的普遍性特征，反映的是西方的高等教育理念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 PPE 专业是中国设立和开办 PPE 专业规模最大、反响最好的学校之一，反映的是中国文科人才培养的独特文化环境、时代需求与本土化人才培养经验。二是两所大学 PPE 专业人才培养相关的研究资料具有可获得性。在进行本研究之前，经过我们的预调查发现，国内外开设 PPE 专业的高校大都没有将其人才培养方案等相关资料公开，但牛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均设置了专门的官方网站用以公布本校 PPE 的各类资料和信息，从中可以洞察中英两国文科人才培养的特点、进程与最新动向。按照资料的可获得性原则，本研究确定的资料文本为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官方网站公布的《2020 年进入一年级的学生手册》(“Handbook for students entering Year 1 in 2020”)、《2020 年进入二年级的学生手册 (适用于二年级和三年级)》(“Handbook for students entering Year 2 in 2020 (applies over Years 2 and 3)”)，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 (2019)》《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 (2021)》，其中分别包括了适用于 2019 级和 2021 级本科生的《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 (PPE 实验班) 培养方案》。

## (二)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是对文科人才培养进行清晰认识与彻底变革。因此，本研究首先在技术层面上探究归纳、完整还原案例学校 PPE 专业人才培养的经验方式、基本路径和突出特征，具体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结构类型、教学方式方法、人才培养结果评价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见表 1)。之所以从这四个方加以解构，是由四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的。即人才培养目标居于人才培养方案的首位和中心，不仅规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规格和质量标准，也决

表1 PPE专业人才培养的分析维度

分析维度	说明
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最初原点，反映了特定专业的根本追求。
课程结构类型	建设特定结构和类型的课程群是大学特定专业能够提供的最基本、最有价值的服务。
教学方式方法	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是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各专业优质教育资源的运用手段，体现了特定专业的教育理念和育人能力。
培养结果评价	结果评价是对特定专业人才培养成效的衡量，评价手段、评价内容、评价流程等评价制度本身体现了专业的价值导向和业务追求。

定了使之目标达成所需要的课程结构、教学方法以及评价方式。因此，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需要辅之以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和制度安排，其基本逻辑是：通过课程的设计与安排、多元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评价方式的合理布局 and 有效支撑，最终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达成。

### 三、案例分析与讨论

与传统单一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不同，无论是牛津大学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其 PPE 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均体现了不同侧重的转型发展逻辑。

#### (一) 人才培养目标转向：从侧重知识传授到注重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发展

一直以来，在设定人才培养目标时，一般都会从知识、情感和能力三个维度来建构。但囿于 PPE 多学科的专业特性，知识和能力维度依然存在，而情感维度由于涉及意识形态，故不作探讨，而将“情感”维度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实际转换为“素质”维度。案例院校 PPE 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打破了传统文科专业以“单一”“片面”“孤立”为特征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在突出强调三个传统专业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深入交叉融合的过程中，树立起以“整体”“全面”“综合”为特征的全新育人目标，实现了由单一学科知识结构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知识结构、由单一专业能力结构转向多学科/跨学科专业能力结构、由单一专业性人才培养转向通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系统转变。

具体而言，牛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PPE 专业都会根据人才成长规律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在坚持循序渐进培养原则的基础上，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均衡、递进发展。在知识获得维度上，均遵循由浅入深、由基础到专业的培养逻辑，首先强调学生对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概念、原理等基础知识的学习、理解和掌握，然后在此基础上使学生对实践中与之相关的学科前沿知识和问题形成更为深刻、全面的理解，从而具备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分析和运用能力。在能力培养维度，均遵循由具体到一般、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以掌握获取各个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融汇贯通的智力技能为基础，进而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即对复杂观点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清晰表达交流的能力，以及学生的可迁移能力——把在专业学习中习得和养成的素质与技能转化为工作和生活中的建设、领导能力。在人格素质维度，相比牛津大学而言，中国人民大学 PPE 专业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学术动机和身体素质提出了专门要求，这既体现了中国长期坚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遵循社会需求逻辑而非学术逻辑的本土化特征，强调学生的综合全面发展。

表2 牛津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PPE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分析

目标 维度	牛津大学PPE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PPE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知识	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有良好的认识和理解。	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外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基础理论。
	在指导和独立阅读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分析哲学、政治和经济主题的能力。	融会贯通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三个专业的理论与方法,集古典与创新为一体,掌握用哲学思维来分析政治、经济现象的技能。
能力	提高学生的批判和分析技能。	具有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具备对所研究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话交流能力。	具备杰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语言表达能力。
	具备独立思考、学习与写作能力,具备高效率的组织调查与单独领导能力。	具备杰出的实际工作能力,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及计算机操作技能。
	掌握持续专业发展技能,并具备将其应用于广泛的就业和生活中去的能力。	——
人格 素质	——	适应全球化与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
	——	打破因学科孤立带来的思维局限。
	——	立志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充满中国文化自信的 leadership 人才。
	——	在体育方面,必须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信息来源: University of Oxford. Handbook for students entering Year 1 in 2020 [R].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1: 6-7;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2021) [R].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19: 259.

## (二) 课程设置逻辑转向: 由单一学科逻辑走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逻辑

瓦斯克斯 (Vasquez) 等学者根据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依存联系程度, 将课程整合模式的类型划分为学科整合、多学科整合、科际整合、跨学科整合。其中, 多学科整合课程是围绕特定主题、使用多门保持独立的相关学科开发课程, 并在相对同一的时间开展教学, 多门平行学科之间的关联要靠学生自己掌握; 跨学科整合课程的特点是: 学科不再是课程的组织中心, 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 学科知识被融入单元或主题之中, 成为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由表 3 和表 4 可知, 牛津大学 PPE 的课程类型属于“多”学科整合模式, 即不同学科分别开设若干门本学科课程并将其罗列开来, 通过学生的学习和掌握, 使不同学科的知识在个体层面上实现相互关联, 至于能否实现多种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则更多地依赖于学生自身的先天悟性和后天勤奋程度; 中国人民大学 PPE 的课程类型属于“跨”学科整合模式: 一是打破以学科为单位形成的院系壁垒, 学生的选课范围涵盖多个二级教学单位开设的 PPE 专业课程, 且部分课程由两位及以上教师配合完成授课; 二是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态度以及相应的高阶思维成为课程关注的重点, 整合课程过程非常重视学

生主体性的发挥以及课程与真实情景和世界的联系，更有利于学生搭建跨学科的知识结构。

表3 牛津大学PPE专业课程结构

学年	学科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第一学年	哲学导论	核心课程	逻辑概论
			道德哲学
			普通哲学
	政治理论和实践导论	核心课程	政治理论概论
			政治实践概论
			政治分析
	经济学导论	核心课程	微观经济学概论
			宏观经济学概论
			数量方法
第二、三学年	哲学	核心课程	伦理学
			早期现代哲学
			知识与现实
			柏拉图：共和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
	选修课程	心灵哲学等23门课程	
	政治学	核心课程	比较政府
			1990年以来的英国政治和政府
			政治理论
			国际关系
			政治社会学
	选修课程	现代英国政府与政治等24门课程	
	经济学	核心课程	定量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数学和概率讲座			
选修课程		发展中国家庭经济等5门课程	

信息来源：University of Oxford. Handbook for students entering Year 1 in 2020 [R].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1: 13-15; University of Oxford. Handbook for students entering Year 2 in 2020 (applies over Years 2 and 3) [R].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1: 13-16.

具体而言，牛津大学的 PPE 专业为 3 学年制，其课程结构按照学年和学科进行安排，第一学年的课程分别由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构成，通过导论性质的核心必修课引导学生入门，打下理论基础。在第二学年开始之前，学生将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自身兴趣任意选择三门学科中的两门，或者继续同时学习这三门学科。第二、三学年的课程结构仍然按照不同学科予以确定，每个单一学科提供的课程又进一步区分为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由学生在导师指导下选择搭配。中国人民大学的 PPE 专业为 4 学年制，课程结构按照课程类型和教学单位进行安排，第一学年以通识课程、素质教育为主，第二学年以跨学科专业教育为主，第三学年为更加专深的专业课程，第四学年以实践为主。相比其他专业，PPE 专业的课程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无论是通识课还是专业课，前 4 个学期的绝大多数通识课程或专业课程属于跨学科课程，且一门跨学科专业课由三位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共同授课，以锻炼学

生的跨学科思维；此外，人大 PPE 还专门开设了 PPE 系列跨学科对谈课，围绕学术热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对谈和诠释，如 2021 年的系列讲座主题为《“哲学+”的视界》。第二，学生的课程选择范围更广、权力更大，三个学院分别面向 PPE 专业的学生专门开设了一组特

表4 中国人民大学PPE专业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	课程类别		学年
通识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第一、二学年
	基础技能	大学外语（非英语专业）	
		公共数学	
		数据与信息技术平台课	
	公共体育		
	通识课	通识核心课程	
		自主选听通识讲座	
国际小学期全英文课			
专业教育	学科基础课		第二、三学年
	专业核心课（跨学科）		
	专业核心课		第三学年
	个性化选修课		第三学年
创新研究与实践	社会研究与创新训练		第一、二学年
	社会实验与志愿服务		
	专业实习		第三学年
	毕业论文		第四学年
素质拓展与发展指导	新生研讨课		第一学年
	劳动教育		第二学年
	心理健康教育		第一学年
	职业生涯规划		
	军事课		
	公共艺术教育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2021）

定课程供其选择，学生在第三学年选择专业课程时的自主权较大，可以根据兴趣偏好和知识基础选择侧重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三者之一的专业课进行深入学习。

### （三）教学方法选择转向：从“教师”单一中心走向“教师”“学生”双中心

根据戴维·肯博（David Kember）等学者的研究，大学教师的教学方法可以分为“信息传递/以教师为中心”（Information Transfer/Teacher-Focused approach；简称 ITTF）和“概念转变/以学生为中心”（Conceptual Change/Student Focused approach；简称 CCSF）两类。其中，ITTF 方法更加关注教师“传播信息”和“传递结构化知识”（imparting information/transmitting structured knowledge）；CCSF 方法更加关注对学生而言的“促进理解”和“概念转化/智力发展”（facilitating understanding/conceptual change/intellectual development）。有研究表明，大学教师越是倾向于采用 CCSF 方法，学生就越倾向于产生深度学习；与之相反，大学教师越是倾

向于采用 ITTF 方法，学生就越倾向于采用浅层学习。其中，ITTF 教学方法能够将学科知识完整、系统地传授给初学者，并确保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和学术发展方向，及时准确地接触到特定研究领域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但学生在其中被置于一个被动接受的地位，因此很难充分调动学习主体建构知识架构的积极性；而 CCSF 教学方法恰好与之互补，这一类教学方法虽然在知识传授方面缺乏体系化，但能够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而非灌输之下，主动建构起跨学科的知识架构。因此，正如张人杰所言：“现应作出的选择，看来不是将‘学生中心’与‘教师中心’推倒重来，而是使之扬长补短，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状态。”

结合案例高校采取的教学方法总结可知，两所案例院校 PPE 采取的教学方式，实际现了 ITTF 和 CCSF 两种方式的结合——课堂教学 (Classes) 和公开讲座 (Lectures) 是两所大学 PPE 专业共同使用的 ITTF 教学方法。尽管如此，两所学校还结合本校办学经验，使用了不同形式的 CCSF 教学方法。比如，得益于历史悠久的住宿学院制传统，导师指导 (Tutorials) 就成为牛津大学 PPE 专业主要且独具特色的教学方式，每个 PPE 本科生至少有分别来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三位导师，每周至少有两次甚至更多的导师指导活动，在师生长期亲密共处中构建起学生的跨学科知识体系；此外，实验室教学法 (Data labs) 的引入使得学习者能够在反复练习中掌握研究方法、提高信息素养，凸显了“学生中心”的教学观 (见表 5)。中国人民大学则主要采取了研讨课 (seminar) 和实践教学的方法。其中，研讨课旨在促进学生参与、师生互动，有利于开展启发式、批判式教学，激发课堂教学活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跨界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实践教学旨在以实际问题的发现、分析、解决为突破口，培养学生的多学科知识跨界整合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识应用能力，

表5 牛津大学PPE专业教学方法及具体操作

教学观	教学方法	具体操作
教师中心 (ITTF)	课堂教学 (Classes)	课堂教学是一种特别适合作业练习的教学方式，每学期结束时，学院会安排学生参加考试，测试其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讲座 (Lectures)	在每个学期开始时，学校会公布一份由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提供的讲座名单，学生会在导师的建议和指导下规划本学年将要去的讲座。
		讲座的内容有的是对著作进行介绍，有的是对一个发展迅速，但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的新兴学科提供权威的观点与概述。 由于Covid-19大流行，讲座可能在线或预先录制。
学生中心 (CCSF)	导师指导课 (Tutorials)	导师指导课是牛津大学最具特色的教学形式，任何学生所参加的导师指导课或大学课程的教师都可以视作学生的导师。
		导师指导课的教学方式是要求学生阅读了特定书单后参与讨论，或带着作业去由导师辅导写作，具体有包括“图书馆搜索、阅读、思考和写作”。
		导师指导课不是用来代替讲座或积累知识的课堂教学，而是用来培养学生连贯的语言论点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解决具体的困难和误解。 由于Covid-19大流行，导师指导课可以是在线的而非面对面的。
	数据实验室 (Data labs)	数据实验室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在学生入学第一年时，向新生介绍统计软件的使用方法，例如STATA和R。

信息来源: University of Oxford. Handbook for students entering Year 1 in 2020[R].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1:9-12.

在学做结合的过程中快速提升学生的事业心、责任感、领导力等综合素质（见表6）。

表6 中国人民大学PPE专业教学方法及具体操作

教学观	教学方法	具体操作
教师中心 (ITTF)	课堂教学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穿插实践调研、学生展示、观影参观等形式,学期结束时进行考试评估。
	公开讲座	公开讲座主要聘请名师名家,围绕若干广泛的主题为学生开设讲座。 公开讲座目的是开拓视野、接触前沿、激发兴趣、启迪智慧,为学生广阔的发展前景穿针引线。
学生中心 (CCSF)	研讨课	研讨课倡导以学生为中心,以阅读或实践(实验)为辅助手段,强调师生的直接互动和学生的小组合作,使学生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适应大学生活,帮助学生塑造专业素养。 研讨课采用研讨型教学方式,涵盖主题发言、课堂讨论、课堂辩论、名家讲座、心得交流、实地参观、模拟实验、个案分析等多元化教学方式。
	实践教育教学	鼓励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调查活动,参与各项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进行专业实习。 实践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增进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使其了解社会、接触生产,树立事业心、责任感。

信息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2019)[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9:494,497,501,503.

#### (四) 人才评价方式转向:从单一终结性评价转向多元评价方式并存并用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始终被缺乏合理、准确、系统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的问题困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系统性改革思想。其中,结果评价目的在于衡量学生在特定时间节点对学科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知识水平;过程评价能够以周期性、动态性视角跟踪学生的发展过程,突出评价的诊断、调控和改进作用,保证学生长期健康发展;增值评价强调不仅要在不同学生之间进行横向评价比较,也要以“自我”为评价维度,对学生在接受教育前后的进步情况进行发展性评价。此外,运用多元的评价主体和标准全方位关照作为完整个体的评价对象,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总体而言,案例院校 PPE 人才培养成果的评价方式本质上是对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与综合评价等评价原则的整体性运用,而且牛津大学 PPE 专业人才培养结果评价更为成熟系统,多种评价方式最终指向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和增值评价等三大评价类型。牛津大学 PPE 人才培养的主要评价方式主要包括:在学生入学、第一学年结束、学生毕业时分别组织的三次考试,以及全程检测学生成长的个人报告和逐年发布的考试条例。其中,预备考试和毕业荣誉考试属于结果评价,学院报告系统的定期反馈属于过程评价,摸底考试与毕业考试共同构成增值评价,考试条例的逐年更新和定期公布不仅确保了教师在进行评价时的规范性,而且发挥学生成长的“指挥棒”作用,为学生明确努力方向和学习重点。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大学 PPE 专业人才培养结果的评价方式较为单一和笼统,以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和整体评价为主,绝大多数课程设置的期中考试、在课程结束时组织的期末考试分别体现了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原则;评价主体和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 PPE 的综合评价趋势,如数学课程、计算机课程等公共课程的考核和学分认定办法则由数学学院和信息学院

等不同院系负责（见表7和表8）。

表7 牛津大学PPE专业人才培养结果评价方式及具体操作

评价类型	评价方式	具体操作
结果评价	预备考试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在第一学年结束时进行，由三门科目组成。
	毕业荣誉考试 (the Final Honour School)	在第三学年（即培养方案最后一学年）结束时进行，由八门科目组成。
	考试条例 (Examination conventions)	适用于一门或多门课程的具体评估标准，规定了老师如何评分以及如何根据评分结果来区分学生的奖学金层次。具体包括评分量表、奖学金分类标准、口试考试标准、进步的奖励、逾期不交作业的惩罚。
过程评价	学院报告系统 (OxCORT) (the college reporting system: OxCORT)	定期根据导师和学院其他老师的反馈来生成个人报告，用以记录学生的学业表现情况，学院还会根据报告，通过专门程序处理学生学业表现不佳等问题。
增值评价	摸底考试 (collections)	学院在每学期开始前组织学生的考试，目的在于测试学生的已有知识存量，并让学生练习参加考试的技巧。

信息来源: University of Oxford. Handbook for students entering Year 1 in 2020 [R].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1: 15-16.

University of Oxford. Handbook for students entering Year 2 in 2020 (applies over Years 2 and 3) [R].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1: 21-22.

表8 中国人民大学PPE专业人才培养结果评价方式及具体操作

评价类型	评价方式	具体操作
过程评价	期中考核	不同课程的期中考核形式多样，包括认真阅读规定的材料，并就阅读材料在课堂上作一次正式的汇报；统一组织闭卷考试等。
结果评价	期末考核	不同课程的期末考核形式多样，包括提交课程论文、统一组织闭卷考试等。
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形式及主体多样，包括课程参与度评价，以及创新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考核与学分认定等。

信息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 (2021) [R].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21.

## 四、结论与建议

### (一) 主要结论

研究发现，牛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 PPE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上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也各自发挥出一些独具特色的做法值得相互借鉴。第一，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两所大学的 PPE 专业均要求学生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实现从一到多、从专到博的跨学科/多学科整合，要求学生完成从智力技能到实践能力，再到可迁移能力的应用性能力发展。第二，在课程结构上，两所大学的 PPE 专业均强调多个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但牛津大学 PPE 专业课程结构体现的是基于学生个体悟性和勤奋程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思路；而中国人民大学 PPE 专业课程结构则体现了基于知识体系和教师课程设计水平的“跨”学科交叉融合思路。第三，在教学方法上，两所大学的 PPE 专业均使用了教师中心 (ITTF) 和学生中心 (CCSF) 两种教学观指导下的多种教学方法，既保证了知识传授的连贯性、准确性、系统性，又调动起

学生学习知识、独立思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知识应用能力。第四,在结果评价上,两所大学的 PPE 专业均采取了结果评价和过程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如牛津大学通过定期颁布规定,保证了评价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并在学生评价中实施了增值评价的评价方法,中国人民大学也基于多元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对 PPE 人才培养的综合评价进行了探索。

从以上结论进一步分析推演,可以得出以下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结论,即 PPE 专业集中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所经历的三大转向——(1)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转向。案例院校 PPE 在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设计中均十分强调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弥补了过去片面、封闭的单一学科只能培养出视野狭隘、适应性差的文科专业人才的弊病,使多个学科的知识、方法、理论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真正融为一体。(2)从知识逻辑到应用逻辑的转向。案例院校 PPE 均采取学生中心、问题导向的教学观,强调文科不仅应当看到那些自始至终伴随人类文明的永恒问题所具有的存在论意义,更有责任去领悟对现实社会进步和未来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方法论价值,从而将文科的视野从理论转移到实践,培养能够介入社会生活、深入大众领域、解决实际问题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3)从培养文科专业人才到造就综合性高素质人才的转向。案例院校 PPE 综合运用多种评价原则开展全方位教育评价,而教育评价又作为“指挥棒”引导学生向综合化高素质方向发展,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培养知识、能力、人格全面发展,兼具深厚家国情怀和开阔全球视野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

然而,在分析对比案例高校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清晰地发现,我国高校文科人才培养要想实现从传统文科向新文科的跨越,必须还要在坚持现有发展特色的基础上,从问题和不足着手,调整并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就目前而言,我国新文科建设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是需要继续保持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和课程结构设计),而在另外两个方面则是需要急需改进的:一是教学方法过于单一。比较而言,尽管两所学校秉持着同样的教学观,但牛津大学 PPE 采取的导师指导、数据实验室等教学方法因有其悠久历史和先进性,因而在传统文科走向新文科的过程中更具典范意义,当下我国高校传统文科的教学方式急需由灌输式走向更具中国特色的教学方式,如书院制等。二是人才培养结果评价缺乏规范化、制度化。评价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来看,我国文科人才培养的评价方式仍然以考试为主,在没有进行分类评价的情况下导致功利主义、科学主义评价观甚嚣尘上,既不利于反映文科教育所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价值性等基本特征,也不能够发挥评价对人才培养和学生成长的积极推进作用。

## (二) 几点建议

中英两所顶尖大学 PPE 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特征,以及中国大学扎根本土形成的卓有成效的经验做法,应当将其发扬光大,并推广至整个新文科建设当中。同时,还要认识到我国文科人才培养仍面临一些问题和瓶颈,并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加快改革发展

进程。

### 1. 优化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实践能力以及全面发展的人格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指向

就知识维度而言，文科与理工农医等各个学科在知识生产层面上的交叉融合，要求新文科人才既要形成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又要具备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秉持跨学科的理念对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前沿科技领域，甚至人类尚未探索到的领域进行“攻城式”的文化发掘、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从而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的揭示、累积和沉淀不同学科文化价值的独特功能。就能力维度而言，新文科人才不仅应当在传统文科的熏陶下成为谈吐有致、博古通今的谦谦君子，更要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热切的人文关怀走出书斋，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长为具有批判精神和领导能力，能够满足社会需求、服务国家发展的国之栋梁。科学技术在研究范式层面的介入，也要求新文科人才必须熟练运用先进科技以开展学术研究。就人格素质维度而言，新文科要以文化人，始终以立德树人作为人才培养根本任务，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兼具中国立场和世界格局、有知识能力、有高尚人格、有家国情怀、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综合人才，使新文科人才以扎实的学识积累和研究能力、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充足的自信心与创新力，在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巧实力”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发挥更大作用。

### 2. 坚持从“多”学科知识罗列的课程结构走向不同学科知识的“跨”学科交叉融合

新文科建设的基本路径在于“融合”：传统学科与新技术的融合获得升级，传统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获得创新，因此，新文科的课程体系设计必须体现跨学科融合性，使一门课程的知识来源于多个学科，特定专业的课程由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授课，这是一种高层次的跨学科交叉融合，即在课程开始之前就打通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和专业壁垒，这对教师的课程设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文科课程建设的两个关键步骤是：第一，优化专业的课程体系，使多个学科为特定专业开设的所有课程与专业目标分解成的若干子目标之间一一对应，确保每个目标都有相应的课程予以支撑。专业是围绕特定培养目标搭建的课程群，而课程又是从学科知识中选择的一部分“最有价值的知识”，因此，在专业层面以“课程矩阵”优化课程体系是较为可行的做法：把一个专业的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的子目标作为一个维度，把不同学科为这个专业开设的所有课程作为另一个维度，通过两个维度的关联考察各门课程与专业目标体系的相关性。第二，提高教师的课程规划和设计能力，鼓励不同学科的教师合作开设同一门课程，开发一流水准的文科“金课”。跨学科的目的不是追求学科大同、磨灭学科之间的差异，而是要基于特定学科立场，发展出更多的交叉领域和创新方向。可见，有必要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跨学科课程建设，发挥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们在单门跨学科课程开发中的合作关系与主体作用。

### 3. 综合运用“教师中心”（ITTF）和“学生中心”（CCSF）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不止包括可以用文字、符号和言语表达的显性知识，更存在着大量的无法运用外显符号说明，且不能以语言、文字等形式传递的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

尽管课堂教学能够有效传递文科的显性知识，但仅有课堂教学只能给学生提供单一的认知经历，即记忆和模仿；而人文社会科学中缄默知识的情境性、文化性、层次性等特殊性质，将会进一步要求新文科采取创新教学方法以丰富学生的认知经历，提高其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因此，新文科教学改革要以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元的认知经历作为基本原则，结合使用“教师中心”（ITTF）和“学生中心”（CCSF）教学观指导下的教学方法，使学习者同时掌握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具体而言，一是要采取“教师中心”“知识中心”的教学方式，通过课堂教学等形式使学生系统掌握显性知识，通过公开讲座等形式使学生及时关注学术前沿，在课堂上设置讨论交流与互相提问的环节，提高师生、学生之间互动性。二是要凸显“学生中心”“问题中心”的教学原则，采取文科实验室、教师指导课等参与性、交流性、实践性教学方式使学生习得文科中的缄默知识，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汉字研究实验室、浙江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实验室等文科实验室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科研与教学的相互促进作用，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对文科研究的卓越贡献，对于新文科人才培养大有裨益。

#### 4. 综合使用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与综合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

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多元性、科学与价值二重性、累积叠加性决定了新文科的人才评价应当建立健全常态化的评价制度、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第一，新文科的复杂多元性要求建立健全周期性、常态化的评价制度。学科体系具有地域性和国别性，作为高等教育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体系属于国家政策范畴，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我国，新文科建设涵盖了除理工农医、军事和交叉学科以外的其他八个学科门类，人文社会科学又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开展思辨、经验和实证研究，这决定了新文科必须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周期性、常态化人才评价制度，以应对其广度宽、难度大的复杂多元性特征。第二，新文科的科学与价值二重性要求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基于事实、追求客观真理、体现科学性，而且蕴含意识形态、追求主观标准、体现价值性，具备价值与事实、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属性。这决定了新文科的人才评价必须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评价者对学生的平时表现和学生的量化得分给出综合性评价。第三，新文科的累积叠加性要求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结合使用。与理工农医科人才可以略过学科发展史而直接进入学科前沿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具有弥散性、积累叠加性，个体必须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回溯经典、领悟精髓，此点没有捷径可走。这决定了新文科的人才评价必须将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结合起来，以诊断性、动态性评价取代惩罚性、功利性评价。

（公钦正，男，山东临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张海生，男，安徽临泉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社编辑，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期刊编辑出版研究。来源：《重庆高教研究》）

## 略论现行评价机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危害

李 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2021年3月15日,《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文章回顾了总书记自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强调,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地方有关部门,各级教育、科技、工程技术和医药卫生机构和领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核心,以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科技评价体系为目标,以改革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为关键,统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推进分类评价制度建设,发挥好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坚定营造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科技评价体系,须先厘清现行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客观评述SCI引入我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SCI怎样被异化为“唯SCI”评价标准,重点从学术论文、科研经费、科学数据外流,数据库议价权、学术主动权、学术话语权受制于人,出版生态、学术生态、社会生态失衡,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战略安全隐患4个方面分析“唯SCI”造成的严重危害,并对评价机制改革提出点滴思考和建议。

### 1. 客观评价SCI引入我国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数据库之一,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作为信息检索和分析工具,基于文献计量原理和分区理论,SCI有利于帮助广大科技工作者及时获取所需文献信息、追踪研究历史、了解学科发展;有利于帮助广大科技工作者跟踪学术前沿、接轨国际合作、参考科研立项、提高研究效率,以助于在国际学术舞台提高本国科研显示度、争取话语权等。基于SCI的分区表对于科研评价有重要参考价值,SCI被高校科研机构广泛采纳。长期以来,在信息传播方面,SCI无论对于科技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早在1970年代,我国出版的《Chinese Medical Journal》和《Scientia Sinica》,先后被SCI收录,中国包括医学研究在内的前沿科学研究成果通过SCI及时在国际传播,对传达中国科学声音、塑造国家科学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19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和科学春天的到来,中国科研领域与经济领域一道打开国门,积极营造面向世界的学术环境,着力促进国际接轨。科技事业的复兴,迫切需要与国际同行开展交流,扩大学术“朋友圈”,以便追赶国际前沿科技,增强国际舞台显示度。一些高校和一批批被公派作为访问学者的学科骨干积极作

为，认识到中国科学家不能缺席世界学术舞台，中国学术研究要获得话语权，首先必须敢于与世界同行同场竞技，有效、通达和便捷的途径之一，就是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980年代末以后，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科技领域打破平均主义、改革职称制度、实施科技奖励制度等的恢复，以及竞争性科技项目的设立，需要构建科技评价方法。文献计量统计系统，不仅使用于科技领域，而且也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于是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应运而生。历史地看，SCI 作为世界性媒介，对介绍我国科技进步成就，增强我国科研成果在国际舞台的显示度，提高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的窗口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持续扩大科研投入，当时的高校科研领域亟待创新科研评价、立项、经费划拨等方面的工作机制，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公平性和激励性，以改变主导科研评价的陈旧体制。在这种特殊形势下，SCI 作为一种客观直接、相对公平的量化指标被引进中国，成为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评价方法，这是对建立科学、公平、公正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的有益尝试。SCI 的引进，对于接轨国际前沿科技，引导国内学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用英文发表论文，推动构建现代科技创新机制和话语体系，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成果国际显示度，推动我国科技出版借鉴国际经验，提升中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SCI 论文引用的客观性、公开性和透明性，有利于打破学术界门阀偏见和论资排辈，促进了高校科研机构“指标面前人人平等”局面的形成。这在当时犹如清风拂面，一扫压抑之气，广大科研人员心情舒畅，比学赶帮搞研究、你追我赶学英语、争先恐后写论文蔚然成风。

近 30 年来，中国发表 SCI 论文总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高被引论文急速增长，为全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向全球分享着中国经验，在国际舞台上，不仅展示着“舌尖上的中国”，还展示着“学术上的中国”，展示着朝着现代化国家不断进取和奋进的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SCI 发挥着窗口、桥梁和纽带作用。我们不能否定其历史的和积极的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如果没有这一段历史，中国科技界也许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如此紧密地与国际科技界联系在一起，科技的各个领域进步也许没有这么快，一些领域也难以引领世界。

## 2. SCI 被异化为评价标准

随着历史的变化，SCI 进入中国后，其功能被渐渐改变，作用也被盲目扩大。1980 年代末，某大学开始重奖 SCI 论文，此后数十年，各高校科研院所等竞相效仿，对 SCI 论文相关指标盲目追求，逐步演变成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科研人才学术水平评价、学科专业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诸方面的重要指标。久而久之，人们对 SCI 的本质与使用方法提出了种种看法。

(1) SCI 的本质及学术出版的功能是什么？推出索引产品的机构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1992 年其又被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 收购。该研究所推出的主要平面索引产品有 SCI、SSCI、A&HCI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ISTP (科技会议录索引)、ISSHP (社会科学和人文会议

录索引)。基于这家机构的商业机构性质,人们开始质疑其是否具备科技评价的权威性。随着对 SCI 的深入了解,人们又进而研究 SCI 的本质,对其在学术出版方面的功能有进一步清醒的认识。

(2) 索引产品能够评价学术质量吗?实际上,SCI 最初并未为评价所生,而是被滥用。据有关研究,“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格罗斯夫妇 1927 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他们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图书馆预算有限的情形下,应该参照什么标准为学生购买供查阅的化学期刊?最简便的办法,当然是找一个权威专家为图书馆开列一个目录清单,但这会受到专家个人局限的左右。格罗斯夫妇的解决方案,是选取知名刊物《美国化学学会杂志》,对它 1926 年发表的 247 篇文章的 3633 条参考文献进行统计,按引用次数对所有被引刊物进行排序,刊物重要性与排序结果直接对应,图书馆可参照此清单进行购买。这种筛选方式操作简便,且不存在太高专业‘门槛’,很快被其他信息科学家借鉴推广到别的学科领域。”尤金·加菲尔德 1955 年在《Science》第一次提出的“引文索引”设想,其本意也是提供一种文献计量学的工具,用以帮助科学家查找感兴趣的文献,并非用于评价。

1973 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科尔和他的哥哥斯蒂芬·科尔(简称“科尔兄弟”)的专著《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科学的社会分层》)。科尔兄弟研究的内容是:到底是什么决定着科学家的知名度?衡量科学家学术贡献时,论文数量和质量哪个更重要?研究结果表明,仅仅用“论文数”来衡量科学产出会产生误导,因为这么做会忽视了论文“质量”这个关键变量,他们第一次提出用科学家论文的“引文数”来衡量其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在研究相关指标时,科尔兄弟了解到,加菲尔德已编制完了 1961 和 1964 年两年的 SCI,于是他们把 SCI 作为工具,用于统计研究者的“引文数”,创设了引文分析方法。然而,引文分析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结果,其应用范围不断被扩大和延伸,不但被广泛用于评价科学研究的影响和质量,而且用于确立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

(3) SCI 引入发展中国家后被绝对化。一些文献计量学者用引文分析预测诺贝尔科学奖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夸大了引文对科研评价的作用。引文数量究竟衡量着学术研究的影响还是学术成果的质量,学界莫衷一是。但是,不少文献计量学者通过对比研究,确实得出引文数量与诺奖获奖概率存在正相关性的结论。

笔者认为:“有影响”的学术研究,一般会有“高引用”;“高引用”却不一定证明学术研究“高质量”,这是客观全面认识引用率,进而认识 SCI、认识影响因子(IF)在评价中的作用的逻辑起点。后来的发展,引用率、SCI、IF 等等计量结果,渐渐偏离这个逻辑,被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绝对化,导致 SCI 被滥用,特别是在正在步入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家中滥用。在发展中国家,SCI 不仅片面化,而且被绝对化。其实,无论是加菲尔德编撰 SCI,还是科尔兄弟运用 SCI 来衡量科学家工作的质量和影响,关注的均是引用。SCI 引入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后,则由强调引用泛化为强调 SCI 论文。

以引文分析作为各类学术排行榜的重要指标，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均采用过各种量化指标，强调发表论文与论文引用。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在衡量美国大学博士专业质量或声誉时，就用它作为所在系教授的研究质量指标之一。挪威还推出了“挪威模式”，用于鼓励学者发表论文。在中国，虽没有国家层面的“科技文献评级系统”，但事实上 SCI 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指标已被普遍认可和采用，将其作为高校科研机构评级分类，医生、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科研工作者晋升奖励，以及研究生获得学位、博士出站和就业的重要参考。SCI 异化为学术成功学中的“解释变量”，与 SCI 期刊论文并非质量指标的逻辑起点、更非评价指标的“原意”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唯 SCI”。

关于 SCI 功能异化并被滥用于科学评价问题，引起科学家们的日趋警觉，并被演化为一系列抵制活动。2012 年的《旧金山宣言》和 2014 年的《莱顿宣言》就是例证。《莱顿宣言》最终形成了科学评价的 10 条原则，成为全球性抵制 SCI 泛化、定义科学评价标准中最为瞩目的标志性事件。

在我国学术领域，SCI 学术计量指标泛滥的问题，主要向 2 个方面发展：一是向人文社科领域泛滥，二是在核心期刊认定中复制。3 大“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南京大学社科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中，有的最初也是为图书馆馆配期刊订购、上架和馆藏目录提供参考目录依据，其结果也变成评价工具——哪个期刊能进“核心”，哪个期刊就变成学术评价、成果质量的“度量衡”，成为学术水平衡量、毕业晋升的高影响论文成果的重要“解释变量”。

### 3. 清醒认识“唯 SCI”的危害

2020 年 2 月 18 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SCI 论文相关指标已成为学术评价，以及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使得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 SCI 论文相关指标，甚至以发表 SCI 论文数量、高 IF 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科技创新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这是国家有关部门在部门规章层面，第一次提出针对 SCI 的具体性治理意见。针对 SCI 由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蔓延问题，2020 年 12 月 7 日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更为明确地指出：当前，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平台评审、科研奖励、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导师遴选、学位授予、绩效分配、学校考核、资源配置等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唯论文”现象，简单以发表论文期刊级别、数量、引用率影响因子、转载情况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重数量轻质量，忽视学术著作、决策咨询报告、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等其他标志性成果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导致学术功利化浮躁化、创新创造动力不足、违背人才成长规律，侵蚀学术风气、污染学术

生态等系统性危害。《意见》明确提出在平台评审、科研奖励、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导师遴选、学位授予、绩效分配、学校考核、资源配置 10 个方面，对“唯论文”问题实施纠偏。《意见》将“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人评文”等 10 种现象，列入严格治理的内容，同样，这也是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在规章层面首次详列治理“唯 SSCI、CSSCI”负面清单，并冠以“不得”字样，明确在文件中依次表述为“十个不得”，表明政府关于治理“唯 SSCI、CSSCI”的强硬立场和坚决态度。

“唯 SCI”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3.1 学术论文、科研经费、科学数据外流

2002 年陈家镛院士指出，我国不恰当地强调在具有高影响因子的 SCI 源刊上发表文章，造成我国大量高水平论文在其他国家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此后关于切实解决我国学术论文外流问题，在科技界、科技期刊界呼声不断。近年以来，论文、科研经费和科研数据 3 方面的外流，呈加速扩大趋势。

#### 3.1.1 论文外流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显示，2010—2019 年中国作者向全球 SCI 贡献了 18.06% 的论文，而中国的 SCI 期刊只收录发表了全球论文的 1.72%，而这 1.72% 的论文的 85.06% 是中国作者贡献的。10 年间，中国作者共发表 SCI 论文 275.5 万余篇，其中 2.2 万余篇发表在中国 SCI 收录期刊上，占 8.10%，另外的 91.90% 外流到其他国家所办的 SCI 期刊上。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不仅论文加速大量外流，而且高被引论文更是加速外流。ESI 数据库中近 10 年的被引频次最高的 1% 的论文中，我国有 14.3 万篇，全球占比 16.62%；但遗憾的是，其中 95% 的论文却发表在海外期刊上。

我国论文超量外流的同时，还拉大中外科技论文交流逆差。中外科技论文交流逆差指数由 1992 年的 24.25 扩大到 2011 年的 72.17，亦即，中国每流出 72 篇论文，仅流入 1 篇外国科技论文。这其中固然有语种和国内期刊影响力差距问题，但是，如果这种我国论文外流“一边倒”的局面不加改变，期刊论文交流的“剪刀差”将越来越大。

#### 3.1.2 科研经费外流

2015 年 12 月，一篇题为《学术界每年向国外“进贡”数十亿的论文版面费，触目惊心》的文章，引起了中央领导关注，有关部门和单位也展开相关调查。虽然此文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与调查情况存在较大出入，此文的观点学界也并不完全认同，但是，论文“外流”出去，变成人家的数据库，我们再“花钱”将数据库从人家手里买回来，这却是事实。笔者了解到，一般情况下，在外刊发表论文，大概有 40%~50% 需要英文润色，20%~30% 需要翻译，单篇论文润色费为 2500 元/篇左右（人民币，下同），翻译费为 5000~8000 元/篇（约 50 元/千字）。同时还要向国外 OA 期刊支付论文处理费（APC）。我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用户向国外商业全文数据库支付订阅费，每年高达数十亿元。我国优秀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必须付出高额订阅费才能获取全文。以 Elsevier 的 ScienceDirect 商业全文数据库为例，其订购

单价超过 200 万元/年，按照我国 300 家订购用户计算，每年就要向 Elsevier 支出 6 亿元的订购费，而这其中中国作者的论文数量逐年攀升，如 2019 年中国论文数量占 ScienceDirect 当年发文总量的 28%，形成学术资源“两头在外”“前后两次付费”的被动局面。科技论文外流造成的经济损失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资助项目，实际上是国有资产流失。

### 3.1.3 科学数据外流

一直以来，采取订阅模式的国际期刊出版商，一般采用共享数据政策，均要求作者在提交论文的同时，提交与论文研究结果相关的数据或数据授权使用的声明，否则将被退稿。长此以往，中国作者在材料、化工、工程、能源、医疗等众多领域的学术论文大量投向国外发表，越来越多的科学数据也随之存储到国外数据库。由于版权权属关系不清晰，合同条款不明确，导致我方不仅难以主张权力，而且由于开源代码也被国外平台托管，造成知识产权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 3.2 数据库议价权、学术主动权、学术话语权受制于人

学术成果和学术资源“两头在外”“两次付费”，造成国际学术出版平台直接掌握数据库的议价权。“唯 SCI”的评价作用，将国内部分科研人员的科学研究方向刚性“指挥”到 SCI 需求，而这些研究有些却偏离我国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经济建设主战场，热衷于追逐热点，追逐新潮的学术概念，追逐新理念、新技术应用这类可能带来高被引的研究题目，从而造成科研人员忽视基础研究，导致原创性、发明性、创新性欠缺，应用价值不高、冷门研究“更冷”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一些重要基础性研究挂“空挡”。“唯 SCI”最终将导致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旁落。

## 3.3 出版生态、学术生态、社会生态失衡

### 3.3.1 出版生态失衡

论文大量流向海外，特别是大量优秀论文流向海外，使得本来就雪上加霜的国内学术期刊被釜底抽薪，加速学术出版生态失衡。2018 年，笔者在所在工作单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所做的多次调研中，多位国内著名科技期刊主编表示，我们自己的刊物已经很难约到院士和知名科学家的学术论文了，这个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一些主编说，院士们的重要论文投海外，一般论文投核心，剩下的被不知名的期刊高价买走，加上国际巨刊以超级平台优势“虹吸”国内优秀稿源，国内科技期刊在极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举步维艰。

### 3.3.2 学术生态失衡

1988 年南京大学将 SCI 论文收录标准引入科技评价体系，这一做法迅速蔓延到一些高校、科研单位。“唯 SCI”的评价导向作用，逐步引导教学科研人员争相将优秀论文发表到国外期刊。高校、科研机构普遍将 SCI 论文数量作为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之一，国际 SCI 期刊论文的权重甚高于国内期刊论文。发表 SCI 论文成为高校教师招聘、薪资待遇等人才分类、定级的重要条件。有些科研项目在申报、结题中明确将 SCI 论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不少高校不仅把创办 SCI 期刊列入“双一流”建设规划，而且将基于 SCI 数据库的 ESI 指标也列入“双一流”建设规划，于是获得 ESI 指标和拥有 SCI 期刊，业已成为衡量高校学科专业进入国际先进水平的

重要指标之一。“唯 SCI”失偏的导向作用，客观造成了科学研究重数量轻质量、重发表轻效益的现象。

### 3.3.3 社会生态失衡

学术研究唯 SCI 论文马首是瞻，导致一部分科研人员不安心基础研究、不安于坐“冷板凳”、不能潜下心来做学问；学术功利思想抬头，导致一部分科研人员不能根本聚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议题设置能力不足，提出新理论的动力不足，开辟新领域、探寻新路径的勇气不足，科研人员目光盯在 SCI 论文发表“热、新、奇、特”上，追新奇、求速效、怕挫折、不敢试错，不敢在独创上下功夫。更有甚者，有的学者为了抢发论文，不惜铤而走险、弄虚作假。问题论文大量出现，与论文数量和 SCI 作为衡量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重要指标不无关系。

更值得警惕的是，唯 SCI 论文马首是瞻还影响着学者特别是年轻教师、青年科学家和医生的学术追求和价值观。

表现在出版生态上，我国科技期刊特别是 SCI 收录的期刊，把追求高 IF 作为办刊成功目标。有些期刊主管部门、主办单位也把 IF 作为考核出版单位的主要标准。我在各类培训中呼吁，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漫长征程和奋力攀登、追求卓越中，我国优秀期刊特别是处在领军地位、核心阵营、高起点方阵中的这部分“不愁吃、不愁穿”的科技期刊，要高度警惕骄傲自满、妄自尊大的“学术富二代”心理，警惕“小富即安”心态，小心堕入“温柔富贵乡”。要去去“虚火”，陶醉于一时的高 IF，会蒙蔽期刊人追梦的双眼、磨灭期刊人创新的意志、麻醉期刊人进取的心灵！我在调研中还发现，为了做高 IF，学术期刊中有意压缩载文量的不在少数。为此，我在第 16 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呼吁，在我国科技论文产出稳居世界第 2 位的背景下，中文科技期刊的总体发文量下降趋势值得各方关注！更有甚者，还有的期刊，为了增加引用率，背弃学术伦理，不仅要求投稿人自己想办法找人“引用文章”，否则拒稿；有的刊社还花钱雇请人“引用本刊发表的论文”。我也在各类论坛和培训中呼吁，坚决压制虚假引用泛滥势头，坚持价值引领、反对不良自引，保持学术纯洁，维护科学公信，坚守学术品格，强化学风建设，在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征程中，绝对不得玷污学风和期刊美好初心！

表现在社会其他方面：一是重奖 SCI 拉大东西地区差异和学校及科研机构差异，加剧“孔雀东南飞”，造成科研和教育资源新的不均衡。据统计，我国大部分人才集中在北京和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西部地区 12 个省区市只占人才总量的 18.8%，边疆民族地区则不足 4%。二是扭曲大学学科和科研布局。李志民指出：东部某省规定，如果 ESI 前 1%就是省级双一流，2%就不是了；这种唯 ESI 导向会严重扭曲、误导科研发展。过度迎合 ESI 也会导致大学学科布局畸形发展。ESI 体系中的学科有容易发论文和不易发论文的区别，很多高校为了提高名次，掀起开办医学院、农学院、材料学院的热潮，不过是为了占上容易发论文的 ESI 学科的“一亩三分地”而已。在 ESI 的 22 个学科中，人文学科仅有 2 个，即经济学与商学、社会科学总论，导致那些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在各项排名中迅速跌落，不被重视，资源逐步缩减。三是加剧学生、学者以至社会性焦虑。是时候下决心对“唯论文”“以刊评文”“以文论成败”开展

深入治理了。

### 3.4 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战略安全隐患

学术论文外流及其流向，涉及国家安全利益。这是各个国家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我国学术论文外流将产生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甚至战略安全隐患。从国家利益看，我国重要机构和重要学术创新成果在国外期刊首发，而出版阅读时滞和语言障碍，难以第一时间用于服务我国科技创新，科研人员难以及时获取信息和实现成果转化。从科技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外流论文中不少是国家资助的各类国家实验室的基金论文，作者甚至是重要科研工作主要参与者。论文“带出”效应，存在国家重大安全利益隐患。这部分论文有的覆盖了我国在材料、化学、工程、生物、物理、数学、肿瘤学、药理、环境科学生态等科研领先领域，也覆盖了人工智能、5G、量子等新兴学科领域，有的还涉及我国尖端科技或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域。Apache 基金会、GitHub 等著名开源软件平台，汇聚了大量开放软件源代码，但都明确表明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条例限制。可见，我国学者如此的论文发表方式和流向，不仅存在极大的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风险，还加剧了某些科技战略资源受制于人的局面，壮大自身实力，构建我国开源软件平台刻不容缓。

值得警惕的是，国外超级平台有意营造学术热点，“钓鱼”式“网捕”学术成果，轻者，走捷径获取别人的研究思路和成果；重者，掌握有关机构及科学家的研究动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直是科学家研究工作担忧的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还涉及国家安全利益。

2019年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军事科研要警惕“SCI崇拜”》指出：“如果说民用领域的‘SCI崇拜’仅是损失一些科技资源，那么在军事领域如果也奉行‘SCI崇拜’，则隐藏着巨大的战斗力风险”。文章以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亚克”等重大科技项目研制“秘而不宣”，从而取得了对于其他国家军队的“代际”优势为例证明，在西方军事领域，不仅最新科技成果不会随便发表，甚至在技术上已经落后的产品，都会受到严密保护。进而厉声警告：“如果我们在军事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发明、论文撰写，也以‘三大索引’[SCI、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为导向，那么，我们不仅是将自己的军事创新自动提供给西方国家，还可能不自觉地落入西方国家预设的陷阱，在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将会面临无法承受的风险和代价。”如果这样，我们有先失“安全门”再失“防火门”的危险。失去“安全门”，将自己的核心战略创新拱手让给西方国家，不自觉地落入西方国家预设的陷阱，在关键领域和关头，失去避险通道。

必须在论文外投制度特别是重要机构、重要领域、重要研究人员的论文外投的制度安排上实施分类管理，完善保密审查制度和避险机制，坚决扭转不加区别地片面、过度、扭曲使用SCI论文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同时，还要明确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重要论文发表，哪些禁止在外刊发表。如果确需发表，只能在有知悉范围规定甚至有涉密级别要求的刊物刊载。还要进一步明确内参、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发表国内相关学术论文的管理办法，引导一部分不宜外发的学术论文有序安排在内参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上发表。一系列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不是不需要SCI，而是不迷信SCI、不唯一化、绝对化。

#### 4. 结束语

古往今来，论文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体现，是理论与思想的传承，是学术交流的载体。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包括 SCI 论文在内的国际学术论文，是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在共同语境下开展学术交流的基本话语方式和成果载体，也是反映国家科学进步、荟萃国家文明成就的重要载体。在国际学术舞台提高科技成果显示度，争夺话语权，需要我国科学家足量充分的国示论文发表，特别是在国际重要学术平台的论文发表，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需要。现在的问题是，在现实的评价体系中，论文发表特别是 SCI 论文发表被绝对化，变成了“指挥棒”，学术期刊也偏离传播的本位，不当地扮演评价角色，出现功能异化。在“SCI 至上”和“四唯”错误的学术导向下，正常的科研秩序被打乱，学术活动甚至变成被称为学术 GDP 的学术“造山运动”，其危害性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必须从根本上纠偏。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学术创新引导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四个面向”上来的必然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吃透中央精神，从制度上，要明确“破”与“立”关系问题，改革评价体系，要坚持立破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理念上，要厘清“存”与“废”关系问题。治理“唯论文”而不是“去论文”；治理“唯 SCI”也不是“去 SCI”。

一要分类实施，落实差别化要求。中央提出，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健全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要求建立以同行评价为基础、定性定量相结合的业内评价机制；强调要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合理设置和使用论文、专著、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实行差别化评价，鼓励人才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作出贡献、追求卓越。中办、国办《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对社会公益性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等类型科研人才的评价中，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论文引用榜单和影响因子排名等仅作为评价参考；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分别建立各有侧重的评价路径。

二要多元建标，解决标准化问题。中央要求：基础研究人才以同行学术评价为主，加强国际同行评价；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突出市场评价，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评价重在同行认可和社会效益。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对于基础研究，论文是成果产出的主要表达形式，坚决摒弃“以刊评文”，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对于应用研究和科技创新，不以论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对于服务国防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般不把论文作为评价指标；完善学术同行评价，不简单以 SCI 论文相关指标和国内外专家评价评语代替专业判断。

三要平衡施策，避免片面化倾向。中央提出，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项目、经费数量等与科技人才评价直接挂钩的做法，建立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落实中央要求，从制度上要坚持多策并举，多管齐下，平衡施策。全面落实代表作评价制度，

推动中外科技期刊同质等效等政策落地。从机制上，要吃透中央精神，明确治理的是“唯论文”“唯SCI”，而非“去论文”“去SCI”。相反，国家支持鼓励优秀论文发表。

四要破立并举，统筹制度性工作。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度建设要处理好“存”与“废”、“立”与“破”的关系。中央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已经做出顶层设计。中办、国办《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坚持评用结合，支持用人单位健全科技人才评价组织管理，根据单位实际建立人才分类评价指标体系，突出岗位履职评价，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使人才发展与单位使命更好协调统元。要强化用人单位人才评价主体地位发挥主体作用、履行主体责任压实主体责任，提出符合各自实际的评价标准；采取合乎实际的评价方法。中央《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为：“力争1年内转变作风改进学风的各项治理措施得到全面实施，3年内取得作风学风实质性改观，科技创新生态不断优化，学术道德建设得到显著加强，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磅礴力量。”改革评价体系是硬任务，优化评价环境、加强人才评价法治建设是软环境。没有评价质量和公信力，没有平等包容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没有不同学术观点敢于碰撞的法制保障，没有求真务实、鼓励创新的氛围和环境，没有激励大胆探索和试错容错机制，建设评价体系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要一边建设良性的评价机制，一边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一边加大对科研失信惩戒力度，一边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单位建立健全学术管理制度；一边建设同行评议的专家库，一边完善同行评议监督制约机制；一边大力实施代表作制度、细化同行评议制度，一边坚决抵制科研领域“圈子”文化，打破相互封锁、彼此封闭的门户之见，反对“学阀”作风，特别是坚决抵制各种利益“圈层”文化、破除种种人身依附关系，严厉惩治学术寻租行为，自觉抵制“打招呼”“走后门”等各种人情评审，杜绝“同行评议”变成“同伙评议”。只有这样，才能在评价工作中，培育起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根据中央关于分类评价的原则，笔者认为，从事基础研究，要瞄准世界一流，更广泛地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敢于在世界舞台上与全球同行同台对话，善于在全球话语体系与世界强手同场竞技，不断增强国际科学舞台的显示度，奋力争夺国际话语权；从事应用研究，要突出区分研究层级、根据岗位特点，联系工作实际，区别提出学术著述的要求。该写论文的如基础研究领域、理论创新部门等，一定要积极倡导论文写作，要有论文要求，并将此体现在人才评价标准里，防止出现“该写的不写”的倾向；没有或不甚有论文特别要求的如技术应用领域，也要明确把“不唯论文”具体体现在标准中，防止出现“可以不硬性要求写的，却非要求写不行”的倾向。避免出现这2种倾向，需要目标统筹、平衡政策。按照中央要求，实施分类评价差异化管理，有效防止“一刀切”“走极端”，避免出现政策执行中新的失偏。

（李军，中国期刊学会，来源：《编辑学报》2021年第2期）

## 交叉学科专业如何设置？美国常春藤高校这么做

罗小婷 李倩文

爱因斯坦曾说，“所有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树的分支”。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知识都是相通的。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学科交叉融合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备受关注。那么，高校应该如何设置交叉学科专业呢？我们来看一下本文作者通过梳理美国常春藤高校的做法而得到的启示。在全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现实性问题需要依靠跨学科协同解决，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要求人才具备多元的知识系统以应对科学挑战。通过交叉学科训练培养人才，以多元创新方式应对科学挑战成为高校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近年来科技界、政府以及科研管理部门从科学研究、科学政策以及科研管理上对交叉学科给予重视，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各自学科布局的机制和模式开展了相应的优化与改革尝试，2020年8月和10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和基金委分别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和新增交叉科学部。然而，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存在诸多差异，发展交叉学科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如何顺利开展新兴交叉学科专业的构建成为当前高校教学改革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访问美国提供跨学科教育项目高校的官方网站，以及美国教育数据中心等网站获取大量的研究信息，以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跨学科专业布局为案例进行分析，旨在为我国高校探索基于专业的跨学科培养方式、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提供启示，激发高校创新活力，提升高校创新质量。

### 一、美国常春藤大学联盟交叉学科专业设置概览

美国常春藤大学是由世界一流学校组成，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等八所大学组成的联盟。跨学科研究最早在美国开始，常春藤联盟全部都是美国的一流名校，其本科教育实践被誉为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典范，强调打破学科边界，塑造本科生跨学科素养。

#### （一）交叉学科专业多以人文社科为基础

现代基本素养主要包含科学、哲学、历史和社会四个方面，从常春藤联盟高校的交叉学科专业的种类来看，其专业存在文理交叉的现象，但大多还是呈现出以人文社科类学科为基础，通过人文社科类学科中的传统学科结合其他学科，以不同视角研究历史现象，如康奈尔大学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专业，哈佛大学的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与分析专业。

#### （二）相近学科更容易产生交叉专业

从常青藤联盟高校的跨学科研究专业设置大多是由相近学科交叉构成。以布朗大学为例，其古典、古地中海和近东研究和考古学专业，是由历史学、古典学与考古学等相近学科构成；其文化资源管理与政策分析专业是由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方向学科构成；其数据科学专业及其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明显由数学学科以及计算机科学学科等相近学科构成；但也存在较远

学科交叉构成的专业，如由历史学与理学所构成的人类生物学专业。

### （三）交叉学科专业设置主要以问题为导向

常春藤大学联盟的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凸显出一定的问题导向。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此高校交叉学科专业有争议解决专业、老年学专业以及可持续性研究专业都是聚焦于全球热点问题，企图通过跨学科培养方式解决近年来的老龄化以及全球环境问题；多数高校设置了认知科学、行为科学，这些交叉学科专业是通过从个人的心理、行为等微观层面考虑问题，是近年来解决国际重要问题所必须的学科专业，也是近些年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关注的领域。

表 1 常春藤大学联盟交叉学科专业具体内容

学校名称	多学科/跨学科专业
康奈尔大学	历史保存和保护；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营养科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它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达特茅斯学院	古代研究/文明；生物和物理科学；古典、古地中海和近东研究和考古学；认知科学；其它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布朗大学	古代研究/文明；行为科学；古典、古地中海和近东研究和考古学；认知科学；沉思研究/探究；文化资源管理与政策分析；数据科学；人类生物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博物馆学/博物馆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
哥伦比亚大学	古代研究/文明；行为科学；争议解决；老年学；历史保存和保护；数学与计算机科学；营养科学；可持续性研究
普林斯顿大学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耶鲁大学	认知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	行为科学；认知科学；计算科学；历史保护和保护；国际/全球化研究；可持续性研究
哈佛大学	古代研究/文明；行为科学；古典、古地中海和近东研究和考古学；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与分析；历史保存和保护；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博物馆学/博物馆研究；自然科学；可持续性研究；系统科学与理论

## 二、美国常春藤大学联盟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分析

### （一）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多以历史研究为主

从以下表格可看出，常春藤联盟高校将大多数交叉学科专业统称为其他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除此之外交叉学科专业设置最多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专业，其次是古代研究/文明，接着是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

交叉学科专业设置中历史研究占多数与常春藤联盟高校重视通识教育相关，耶鲁大学重视以通识教育科学为基础，引导学生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地理科学、艺术科学和社会学研究，布朗大学则强调在通识教育过程中建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四个核心领域的联系，这些高校在通识教育中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十分注重学生的社会与历

史素养。

表 2 常春藤大学联盟交叉学科专业数量分布表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专业	Freq	Percent
其它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6	11.32%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	4	7.55%
古代研究/文明	4	7.55%
行为科学	4	7.55%
认知科学	4	7.55%
历史保存和保护	4	7.55%
古典、古地中海和近东研究和考古学	3	5.66%
可持续性研究	3	5.66%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3	5.66%
博物馆学/博物馆研究	2	3.77%
科学、技术与社会	2	3.77%
营养科学	2	3.77%
争议解决	1	1.89%
人类生物学	1	1.89%
国际/全球化研究	1	1.89%
数据科学	1	1.89%
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与分析	1	1.89%
文化资源管理与政策分析	1	1.89%
沉思研究/探究	1	1.89%
生物和物理科学	1	1.89%
系统科学与理论	1	1.89%
老年学	1	1.89%
自然科学	1	1.89%
计算科学	1	1.89%
总和	53	100.00%

## （二）交叉学科专业的学位授予规模突显学历层次差异

首先，常青藤高校交叉学科的专业设置涉及了不同学历层次，并且专业学位授予数量在不同学历层次上分布不同。从以下表格可看出，整体上高校交叉学科专业的学位授予数量在硕士层次分布较多，以哥伦比亚大学为典型，其专业分布呈现出硕士生交叉专业的授予数量为 254 个，是本科生的 5 倍；而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耶鲁大学以及达特茅斯学院都是本科生授予数量总和多于硕士生。可见高校在不同层次对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常青藤联盟高校都强调在本科阶段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训练学生应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常青藤高校在具体交叉学科学位授予规模方面具有层次差异性。对于同一跨学科专业，不同高校在学位授予规模上具有层次分布差异，以营养科学为例，在康奈尔大学，这个交叉专业本科生的学位授予规模较多，而哥伦比亚大学则从硕士层次才开始大规模招生，这可能跟不同高校对于营养科学人才培养阶段的理解有关。布朗大学的行为科学招生规模主要集中于本科阶段，而哥伦比亚大学则在硕士层次的学位授予较多。此外，高校对于不同学科专业的招生阶段也具有自己的考量。如达特茅斯学院对于古典、古地中海等文科类交叉学科专业主要集中于本科层次，而对于生物和物理科学则集中于硕士和博士阶段；布朗大学内

部的人文类学科则在硕博层次均有涉及，同时自然科学的跨专业则从本科就开始设置。最后，我们发现世界顶尖的高校，如哈佛和耶鲁，似乎倾向于从本科就开始对于理科生培养跨学科思维，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类交叉专业，则更倾向于从硕士层次开始授予学位。

### 三、对我国交叉学科专业设置的借鉴

表3 常春藤大学联盟具体交叉学科专业学位授予数量的层次分布表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学校名称	本科	硕士	博士
康奈尔大学	历史保存和保护		5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		2	1
	营养科学	42	8	13
	科学、技术与社会	3	4	3
	<b>小计</b>	<b>45</b>	<b>19</b>	<b>17</b>
达特茅斯学院	生物和物理科学		18	4
	古典、古地中海和近东研究和考古学	9		
	认知科学	12		
	其它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2		
	<b>小计</b>	<b>23</b>	<b>18</b>	<b>4</b>
布朗大学	行为科学	10	1	
	古典、古地中海和近东研究和考古学	0	1	4
	认知科学	13	2	2
	文化资源管理与政策分析		15	
	数据科学		32	
	人类生物学	39		0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25	3	0
	科学、技术与社会	12	15	
<b>小计</b>	<b>101</b>	<b>69</b>	<b>6</b>	
哥伦比亚大学	争议解决		48	
	历史保存和保护		27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20		
	营养科学	0	77	8
	可持续性研究	31	102	6
	<b>小计</b>	<b>51</b>	<b>254</b>	<b>14</b>
耶鲁大学	认知科学	30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9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		6	5
	其它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54		
	<b>小计</b>	<b>93</b>	<b>6</b>	<b>5</b>
宾夕法尼亚大学	行为科学		63	
	认知科学	58		
	计算科学		6	
	国际/全球化研究	47	63	
	可持续性研究		4	
	<b>小计</b>	<b>105</b>	<b>136</b>	<b>0</b>
哈佛大学	行为科学	0	1	2
	古典、古地中海和近东研究和考古学		1	0
	历史保存和保护		12	
	博物馆学/博物馆研究		40	
	自然科学	29		
	可持续性研究		7	
	系统科学与理论		5	
	<b>小计</b>	<b>29</b>	<b>66</b>	<b>3</b>
<b>总和</b>	<b>447</b>	<b>568</b>	<b>49</b>	

#### (一) 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应具备问题导向

与传统学科不同，交叉学科的设置就是要解决更为重大复杂的问题，因此交叉学科专业

的设置应注重结合问题情境，强调其运用多元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训练学生运用多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

### （二）交叉学科专业设置立足多元

交叉学科专业是为了打破学科边界，构建多学科系统知识的渠道，因此交叉学科专业的设置应该基于多元学科，充分吸收不同学科的知识脉络，再此基础上孕育新兴交叉学科专业，以不同学科的经典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一个多元的知识系统。

### （三）交叉学科专业设置需要考虑层次性

高校应基于自身的学科特色，根据学校在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科基础以及学校资源设置交叉学科专业。不同学历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不同学校的人才培养理念也各有千秋，高校在设置交叉学科专业时不可一概而论，失去了交叉学科专业的多元创新特征。

### （四）交叉学科专业设置考虑学生发展阶段

不同的交叉学科专业具有自身内在逻辑。有的交叉学科的人才可能需从本科开始培养，而有的交叉学科则可能不符合本科生的特质，特质包括其自身知识接受程度、价值观成熟程度等，就需要从硕士阶段开始。此外，交叉学科的设置层次还需要结合高校本身实际情况。如文章中所提，对于同一交叉学科，不同高校设置阶段有所不同，这也可能与高校本身相应交叉学科人才的师资队伍规模和质量、与此专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有关。

总之，每个交叉学科专业如何设置，以及设置后不同层次的知识分配到什么深度，需要秉持以问题为导向，仔细分析不同学科的内在交叉逻辑，并结合学生的发展阶段、学校的整体水平进行考量。

（罗小婷，李倩文，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来源：微信公号“一读 EDU”2021年10月9日）

## 哈佛大学的三次转型：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生成的历史经验

赵婷婷 郭曼瑞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当今我国社会发展赋予大学的历史使命。西方大学有着近千年的发展历史，其中有很多大学一直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作为世界大学的标杆，一直是很多大学效仿的样板，因此研究哈佛大学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经验，不仅可以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启示，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美国以及世界这类内生型一流大学生成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的理解。当然哈佛大学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个宏大工程，本研究期望从大学组织转型视角切入，用“美国大学”“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来概括哈佛大学在不同时期的组织特质，并力图结合大学组织的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来描述它的这三次重大转型过程，以便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提炼其历史发展经验，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启示。

## 一、大学组织转型的相关研究及分析

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机构之一，从中世纪大学到今天的大学，组织变革伴随着整个大学发展史。这些变革有的是局部性变化，有的则是整体性变革；有的是缓慢的、潜在的变化，有的则是快速的、明显的变革……总之，大学组织变革与大学发展共存。

在大学的各种变革中，总有一些变化和其他变化不同，如克拉克·克尔就曾从大学类型变化的角度概括其历史发展阶段，他认为纽曼时期的大学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弗莱克斯纳时期的大学变成了“一座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而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大学则更像“一座变化无穷的城市”，可以看出，克尔所说的这种大学类型的变化更具整体性、同时也更为深刻，我们认为，这种变革就可以理解为大学组织转型。从词义来看，转型在汉语中“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在英语中 transformation 则指“某人或某事彻底的改变 (a complete change)”，因此，用“转型”这个词强调事物的根本性改变，有助于更好地区分这种变化与其他变化的区别。

在大学组织研究领域，对大学组织转型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从国外兴起。虽然当前国内外仍有一些研究将“大学组织转型”和“大学组织变革”混合使用，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两者进行区分，这说明“大学组织转型”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的转型总是先从大学基层单位和整个大学的若干人开始，他们志同道合聚集在一起，通过有组织的创新，改革大学的结构和方向，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才能发生。”詹姆斯·杜德斯达认为：“大学转型必须重视环境的变化，关键是要认识到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大学组织转型不仅能适应多变的环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改变这个随后几十年时间里大学所处的环境。转型的目标是大学职能的拓展和延伸，但大学最基本的职能依然是培养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有教养的公民。”理查德·特罗林格认为，大学转型“引发了组织能力的巨大变化，以实现目标或改变组织的结构、使命和目的、文化或认知。它使该组织有可能有一个与其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否则在它发生的时间框架内是不可能的”。Junaid Siddiqui 认为，“组织转型的核心是当人们为了系统的目的、实践和结构而改变他们的期望、假设和价值观时的一种改变。当教育被赋予一个新的目的时，它需要在系统的所有层面上的转变，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教育学假设的转变”，因此他认为，教育转型是“范式的改变”，而不是“系统的简单修补”。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能够对大学组织转型获得以下三点认知。第一，大学组织转型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而根本性主要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发生变革的组织要素是根本性的，大学组织转型并不一定是“全要素变革”，但一定是关键及核心要素的变革；另一种是变革对组织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可能改变组织的“结构和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组织走向一个“与其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应该说，这也是大学组织转型与大学组织变革最核心的区别所在。第二，大学组织转型往往发生在大学所处环境与大学组织结构不平衡时期。也就是说，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大学组织转型的根本动因，因为只有转型才能适应环境，同时也有可能改变和塑造环

境，前者是“适应性转型”，后者则是“主动性转型”。第三，大学组织转型的目标和结果往往都是大学职能的拓展，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总是倾向于对大学组织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大学只有不断拓展职能才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是大学无论怎样拓展职能，其最基本的职能还是培养人才，离开了这一点，大学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转型也就不再是作为大学这种组织的转型，而是从大学组织变成了其他类型的组织。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大学组织如何转型，其组织的核心职能不能变。

但是，这些研究也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深化。第一，大学组织转型研究需要落实到对具体大学的研究当中，不深入到大学的发展历史，转型研究无法推进；第二，大学组织转型研究是一个探寻的过程，应借助院校研究路径并引入问题史研究和微观史深描技术，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提升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期望通过对哈佛大学转型发展历史的深度分析，回答如下问题：哈佛大学是如何通过转型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其转型发展经验有哪些？这些经验对我国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 二、哈佛大学的三次转型

163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清教牧师埃利奥特致信马萨诸塞当局，力陈建立一所学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议会正式通过议案，批准建立这所学院。1637年11月，马萨诸塞议会任命了校监委员会，负责筹建和管理学院。1638年，学院所在地更名为剑桥，学院也得名为“剑桥学院”，并正式开学授课。1639年，为了纪念约翰·哈佛的慷慨捐赠，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哈佛学院改名为哈佛大学（为论述方便，以下统称为哈佛大学）。

### （一）向美国大学转型

哈佛在成立之初完全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为模板建立起来的，从学院章程到课程设置，它都严格而忠实地模仿剑桥模式。但是这种效仿并没有持续多久，建校不久之后，哈佛便开始了突破和改造英国模式的尝试，并最终成为一所真正扎根于美国本土的大学。

1. 突破了英国的学位授予制度，为美国大学的合法性存在奠定了基础。按照英国传统，大学的学位授予权是由国王或教皇授权的，当时在英国只有牛津和剑桥享有这一权利，这既是教会控制大学，也是老大学控制新大学的手段，体现着很强的等级色彩。初创的哈佛大学没有获得宗主国授予的这一合法权利，但哈佛并不固守英国的这一传统，于1642年首次授予9名毕业生文学士学位。1650年，哈佛从马萨诸塞殖民地政府获得了《哈佛学院的校长与评议员特许状》，“哈佛学院的校长和评议员”被赋予了法人地位，自此哈佛依照殖民地政府的特许状拥有了颁发学位的权利。正如美国史学家评论的那样：“假如英国那种在当地获得法人权利，并可颁授学位的垄断机构与其他各类学校之间的明确区别成功地移植于此地，假如为所有美洲殖民地建立单一的皇家大学，假如颁授学位的权利在所有殖民地遭到明确禁止，那么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甚或美国文化中许多其他事物的历史——也将迥然不同。”

2. 突破了英国大学传统的行会自治管理模式，从组织结构上塑造了美国大学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特质。受中世纪行会自治模式的影响，英国古典大学的管理权实际集中在同乡会、教师会和评议会等校内自治组织手中。哈佛大学虽然在初创时模仿剑桥大学的结构，但在管理制度上与剑桥大学截然不同。由于哈佛是殖民地政府和教会批准建立的，筹建和管理哈佛的校监委员会也是由这两方派出的人员组成，学校的管理大权因此完全掌握在校外人士手中。然而，在学校日常工作中，这种由校外人士管理大学的做法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如校监们很难做到定期召开会议以讨论学校事务，且大多不愿意投入精力和时间，而校长虽是学校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却没有相应的权利。于是，1642年马萨诸塞议会重新改组了哈佛校监委员会，批准哈佛校长作为校方唯一代表参加该委员会。1650年，哈佛特许状进一步规定，“为了便于学校管理，设立一个住校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处理学校日常工作”，这就是后来的董事会，至此哈佛大学的“双院制”管理模式基本成型。这种管理模式使得哈佛从建校起，就形成了接受校外人员管理的传统，这也塑造了哈佛与英国古典大学完全不同的特质和文化，大学与社会紧密联系的观念从其建校起就已经潜藏在其基因当中。

3. 突破了英国大学的古典自由教育，在充分吸收德国大学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在18世纪中期以前，哈佛的课程体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并反映了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三种倾向：中世纪七艺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主体的倾向、文艺复兴对古典语言兴趣的倾向、渗透着宗教改革的宗教教育倾向。1737年，霍利·约克校长上任，对哈佛沿用了近百年的课程体系进行了全面检查与改革，他的贡献主要是将牛顿的“自然哲学”、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等选做教材，到1769年，当他任期结束时，哈佛本科生课程的所有教材几乎全部更换一新，其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已经开始超越保守的英国大学。19世纪上半叶，科克兰校长任命了第一批留学德国的学者继续对古典课程体系进行改革，1825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蒂克纳教授主持教育改革，他的主要举措有：第一，改革教学方法，摒弃背诵式教学方法，改用全新讲座式教学方式授课，启发学生思考和讨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按照学生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和能力对其进行分组，学生不必拘泥于固定学年制的束缚，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安排学习进程。在蒂克纳改革思想指导下，哈佛于1825年修订的《学校章程与规则》中第61条规定：“学生可以按照实际中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原则分组，分组需参考他们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和能力，鼓励各组学习速度同学科知识内容相结合。”这一改革措施蕴含着选修制的思想萌芽。

19世纪70年代，艾略特的改革使得哈佛大学在美国本土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型上迈出了一大步，他所创立的本科课程自由选修制对美国人才培养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他打破了古典课程体系长期盘踞甚至垄断美国高等学校的局面，克拉克·克尔认为，“如果学生能够自由选课……教授们便可自由地提供他们的商品”，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开设“自己的课程”，而不必像以前那样要受到古典教育体制的约束和限制；第二，他打破了沿袭已久的年级制教学组织方式，催生出了不同于欧洲的、以学分制和选修制为核心的新型教学组织方

式。虽然开始时选修制遭到了来自校内外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但是到 19 世纪末，几乎所有美国高校都采取了选修制，其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逐渐体现出来。

美国本土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最后一步是集中与分配制度的确立。1909 年，洛厄尔接替艾略特成为哈佛大学校长，他上任之后开始对自由选修制进行改革。1914 年，哈佛大学开始全面实行集中与分配课程制度，具体做法是：在哈佛本科生就读期间所必须完成的 16 门课程中，有 6 门必须集中在某一学科领域或专业领域，剩下 10 门中至少有 6 门分配到所学专业以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领域中去。可以看出，这里的集中课程就是指专业课程，其目的是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而分配课程则指通识课程，其目的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洛厄尔认为，集中与分配制度很好地协调了古典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矛盾，至此，“通识+专业”的美国本土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形成，并被美国很多大学所效仿，美国的人才培养已经走上了与欧洲古典自由教育不同的发展路径。

## （二）向研究型大学转型

哈佛在成立之初是一所小规模的教学型本科学院，创建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留和传承清教文化，培养牧师。从 19 世纪开始，哈佛大学通过发展专业学院、建立研究生院、加入联邦科研计划等措施，成功实现了从教学型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发展。

1. 重塑传统专业学院，增设新型专业学院，构建现代研究型大学基本架构。早在 18 世纪，由于科学运动和启蒙思想蓬勃兴起，柏林大学出现新的学术组织形式——讲座制。1728 年，哈佛大学仿照德国设立了以“赫里斯”命名的自然哲学和数学讲座，聘请杰出学者担任讲座教授，进行教学与科研工作，开启了美国大学自然科学知识传授以及自然科学研究的序幕。之后，哈佛大学又相继设立了神学、医学、法学讲座。虽然三者都是从中世纪大学就存在的传统专业学院，但是以讲座制发端的神学、医学、法学教育却与之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概括地说，前者更强调职业性，以培养职业人才为主要目的；后者则更强调研究性，是在柏林大学新理念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新型教育制度。1782 年，哈佛大学依托医学讲座成立医学院，实施正规且严格的医学教育，医学士必须有至少 7 年的临床实践，并通过公开考试和拉丁语与英语的答辩，方可申请到医学博士学位，克尔认为，哈佛大学的医学院“把医学从传统行医者手中转移到了科学家手中”。19 世纪初，神学院和法学院也相继成立，它们也承袭医学院的特点，重视科学研究，提倡学术上的自由探索，正如神学院的宗旨所强调的那样，“不是反复灌输任何宗派的特殊的东 西，而是将学生置于有利的环境去探讨基督教教义的真谛”，至此，传统的专业学院在哈佛大学得到了改造和重塑。19 世纪中叶，随着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思想观念、科学成果和工程技术的输入，哈佛开始越来越重视理工科教育的发展，劳伦斯理学院应运而生，它汇集了一批美国科学界的精英，开启了以新兴学科专业为基础建立专业学校的浪潮之后，哈佛大学进一步拓展专业学院，成立了商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等更多新兴专业学院，构建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架构。

2. 改造了德国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理念，引领了美国传统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

柏林大学提倡教学和研究相结合，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培养学者和科学家：讲座用来传递新的研究成果和背景材料；研究会和实验室用来推进和探索新知识；教授教给学生基本方法和技巧。在德国大学里，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师徒式的个体间的关系，教学和科研结合也主要依赖于教师个体来实现。德国的理念和做法被来自美国的访问学者带回国，但是在美国它却变成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教育制度。

19世纪中期，耶鲁大学最早开设博士研究生课程，1861年开始颁授哲学博士学位。187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创建了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的新型大学模式。面对新老大学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改革举措，艾略特认识到，哈佛必须发展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才能吸引来真正的学者。1872年，艾略特在哈佛大学建立研究生部，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新型大学不同，哈佛大学探索了一条在美国传统大学中发展研究生院的道路。艾略特首先区分了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不同导向，明确了两者是学生学习的两个不同阶段，其要求是不同的，并规定申请医学院、神学院和法学院等高级学位的学生必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商学院的研究生在接受政治经济学、商法、公共商务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之前，其能力必须接近于一个在德国大学做了两年哲学研究的学生。从1905年开始，艾略特又对研究生教育进行分类，以明确定位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职能。他将原有的研究生院更名为文理研究生院，偏重科研训练，培养学术人才；又设立了应用科学研究生院，包含工程学、建筑学、应用化学、应用生物学和应用地质学等学科，注重职业训练，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为美国传统大学树立了榜样，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以及一些州立大学都走上了同哈佛大学一样的改革道路，可以说，哈佛大学对美国现代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引领作用。

3. 接受联邦政府的科研拨款，开启了有别于德国古典科学研究的现代科研，加快了向现代研究型大学转型的步伐。19世纪的德国大学强调纯科学研究，并有意识地使得这种研究工作与实际应用保持一定的距离，体现着古典大学科学研究的特点。与此同时，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内涵。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莫雷尔法案》，为各州提供联邦土地建立公立大学和学院，并期望这些赠地大学能够为所在州的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在这种背景之下，各赠地大学除了教授机械、工艺、军事战术和农业等课程外，还开发与农业和机械工艺有关的教育与研究项目，建立农业研究和实验站，引发了农业生产和科学养殖上的伟大革命。彼时恰逢德国的科学研究理念传入美国，于是“德国模式赋予‘土地拨赠’观念以学术的声誉和内容”，这使得不是赠地大学的哈佛“也能走向与康奈尔大学——所有拨赠土地新建的大学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这种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为二战时期哈佛等顶尖研究型大学加入联邦科研计划奠定了观念基础。

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私立大学都面临着严峻的财政赤字，但是为了维护学术自由，哈佛、耶鲁等130多所私立大学拒绝接受联邦政府的救助。随着二战的爆发，

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战争的到来使大学与联邦政府的合作获得了更高的合法性，在特殊时期为国家服务是超党派的，符合国家和美国人民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从一名联邦科研拨款的反对者变成了一名积极的组织领导者，他本身是一位卓越的化学家，出任了美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曼哈顿计划顾问，在国防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哈佛大学也加强了与政府的科研合作，同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诸如雷达、声呐、原生质代替血浆等重大科研合同，获得大量经费资助。据统计，在与联邦战略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签订合同的大学中，哈佛获得 79 份合同，排在第一位；所获资金总数为 3000 万美元，排在第三位，仅次于 MIT 和加州理工学院。通过接受联邦科研拨款，哈佛大学获得了大量经费支持，渡过了经济萧条期。数据显示，“联邦的科研经费主要用于相对少数几所学校”，其中，“6 所大学得到了这些资金的 57%，20 所大学得到了 79%”，而哈佛就是这 6 所大学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联邦科研拨款为哈佛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提供了有效助力，不仅为其改善了学校办学资源条件，更为其赢得了学术声誉，从而推进了教师队伍、研究生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

### （三）向世界一流大学转型

19 世纪 50 年代，哈佛并不算美国最卓越的大学。1866 年，一位哈佛教授发表文章指出，哈佛当时的情形几乎还不如建校只有 25 年历史的密歇根大学，“与之相比，我们像是一所地区性的小学校，除非马萨诸塞州政府收养我们，我们不要梦想去与西部的学校竞争。”但是自 19 世纪后，哈佛大学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渐成为国内一流大学，20 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完成了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转型。

1. 重视一流教师的聘任，构建规范的学术职业制度，营造教师发展的良好环境。哈佛大学非常重视聘请一流教师，不断提高教师待遇。早在艾略特时期，他就明确提出“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教师”的观点，为此，哈佛大学不惜重金吸引全美最优秀学者来校任教。当时很多大学教授的年薪都在 3000 美元以下，艾略特校长把哈佛大学的标准提高到 4000 美元，这就使得哈佛大学能在全美甚至全球招聘到一流学者，教授队伍的数量从 1869 年的 23 位上升到 1909 年的 169 位。卡特尔曾对 10 个学科领域的 1000 名最杰出的美国科学家进行了调查，在 401 名隶属于研究型大学的科学家中，哈佛大学有 66 人，排在第一位。1933 年 9 月，科南特校长提出了一项被称为“300 周年基金”的计划，为杰出的哈佛教授提供特殊学术职位待遇，以促进这些教授开展前沿的跨学科研究，并且使教授们能够在不受约束和外界干扰的自由环境中开展工作。

同时，为了规范学术职业制度，哈佛大学在 1900 年就建立了由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组成的大学教职系列，不同等级教师享有不同权利，这一制度被当时的很多大学效仿。在教师的聘用和晋升上，1938 年科南特校长在任时，正式确定了“非升即走”制度，即非终身教职人员的最长任职年限是八年，任期期满后需要按照程序对其进行正式评估，评估标准应教学与科研并重；之后科南特又提出，应根据教师类型对评估标准进一步细化。经过这些举措，哈佛大学构建起了规范的学术职业制度，为教师营造了公平、稳定又具有激励作用的职业发

展环境。

2. 始终致力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保持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领先地位。哈佛大学在历史上经历了四次大规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从艾略特的自由选修制改革，到洛厄尔的集中分配制改革，到科南特的通识教育改革，再到博克的核心课程改革，可以说，哈佛的每一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都能切中时弊，对美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1870年，艾略特推行自由选修制改革，力图解决当时古典自由教育中的僵化、缺乏活力、扼制学生兴趣等问题，选修制一经推行，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由，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在美国的很多大学中得到推广。但是，随着选修制的实行，它也逐渐暴露出两个弊端：一是学生选课过分放任自流，二是使学生过早专业化。于是，1914年洛厄尔校长用集中与分配制代替了自由选修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其存在的弊端。然而，选修制和集中分配制虽然解决了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程多样性等问题，却未能解决教育和课程的统一性问题，于是1951年科南特校长正式推行通识教育课程改革，规定除学习本专业的课程外，学生必须学习通识教育课程，以使大学能够发挥塑造学生价值观的作用，为美国社会培养合格公民。应该说，科南特的通识教育思想和模式至今仍影响着美国以及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迈进，美国本科教育质量出现严重的下滑趋势。博克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后，提出要重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课程体系。他主张本科生教育除专业课和选修课以外，应建立一套共同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体系，目的是“鼓励学生用批判的态度来接受知识，使他们了解在一定的领域里存在着什么样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是如何被应用的，对他们自身有什么意义”。核心课程改革是哈佛大学回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人才培养所进行的创新，许多高校纷纷效仿，对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顺应现代学科发展趋势，推进跨学科组织的发展和创新。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大学教学和科研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91年，陆登庭出任哈佛校长，同时开启了哈佛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发展和创新之路，又一次彰显了哈佛大学不断改革的进取精神以及始终引领世界大学发展的创新能力。

陆登庭校长上任伊始，就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学术计划，以应对20年之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他成立了一个由校长、副校长、教务长、院长等组成的管理小组，定期见面，讨论学校的学术计划及学术布局，以形成一个全校范围内的全面发展远景，包括整个大学的目标以及每一个学院或学术单元的发展重点，推进跨学科组织的发展就是这一计划的重中之重。哈佛大学的跨学科组织主要有三种形式：跨学科合作项目、学院附属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独立设置的跨学科研究中心，陆登庭校长在任期间大力发展的是独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这类机构独立于学校内其他研究和教学组织，一般是超越学院层次的联合体形式，其特点在于项目导向性、学科交叉性和组织开放性，哈佛大学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拉德克里夫高

等研究院等都属于这种形式的跨学科组织。

为了推进独立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发展，哈佛大学从政策、管理、资金等多方面提供支持保障。从政策上看，在哈佛大学 1998—2000 财政年度计划中，曾明确规定要对跨学科动议项目进行扶持。计划指出，学校要重视跨学科首创机构的发展，要关注每个机构的学术计划更新，保证所需的财政、人力资源、研究、出版和发展在内的行政支持。从管理上看，哈佛大学主管教务的常务副校长统一管理与跨学科组织相关的事宜，具体涉及战略规划、管理统辖、资助和项目优先等，两名副校长则分别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予以分管协助，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均隶属于校级部门，并不依附于任何院系。从资金上看，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校内拨款，一般每年定额资助一次；二是政府投入，随着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社会贡献力的日益突出，政府对其经济投入也正在日益加大；三是社会资助，包括基金会捐款、个人捐款、企业捐赠以及其他机构捐赠等。经过这些改革，哈佛大学的跨学科组织迅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实力，为哈佛大学在 21 世纪保持学术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三、哈佛大学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

有句俗语叫“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可见哈佛大学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哈佛大学作为美国的第一所大学，不仅建校时间早，更重要的是它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精英人才，在美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起到了引领和榜样作用，可以说，哈佛大学所探索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创新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的大学发展。

哈佛大学能拥有今天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地位，与其始终保持进取精神、创新意识和变革能力密切相关。尽管哈佛大学在美国一直名列前茅，但是它始终积极关注社会变化，努力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故步自封，积极谋求转型发展。总结起来，哈佛大学在转型发展中的主要经验如下。

第一，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哈佛大学转型发展的最根本动因，但哈佛大学的转型不是适应性转型，而是主动性转型。哈佛大学虽然依照英国古典大学而建，但美国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英国的新的社会环境，因此，哈佛从建校之初，就不得不面临着欧洲古典大学模式和新兴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从组织转型理论来说，这是组织转型的最重要原因。但是，不平衡状态所导致的大学组织转型，既有可能是被动适应环境的适应性转型，也有可能是主动改变自身以及环境的主动性转型，哈佛大学的几次转型都属于后者。究其原因，一是哈佛大学作为美国的第一所大学，它除了效仿欧洲古典大学，没有本土大学可供学习和参考，必须自己探索发展之路；二是哈佛大学一直自诩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必须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彰显自身价值；三是相比于欧洲，美国社会更加自由和民主，为哈佛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第二，哈佛大学在转型过程中不仅改变了自己，更改变了别的大学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应充分重视个体大学的转型发展，这是整个高等教育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在哈佛大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它所推行的许多组织制度创新和教育改革，一经推出就被当时美国的

其他大学所效仿，这从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尼尔森对艾略特的评价中可见一斑：“艾略特不仅影响了哈佛大学的一切，而且使哈佛成为国家同类学校的佼佼者。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没有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不受艾略特在哈佛改革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哈佛大学的转型史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史，是一所大学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哈佛的成功有其特定的原因和历史机遇，但是这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个体大学转型的重要意义。正像组织转型是从核心和关键要素开始一样，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转型也要从组成系统的一所大学尤其是那些在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学开始，离开个体大学转型谈国家高等教育转型，后者就成了空中楼阁，只有切实推进个体大学的转型，国家高等教育才能改变，我们所处的社会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三，虽然哈佛学历经了美国大学、研究型大学 and 世界一流大学的三次转型，但哈佛大学最核心的转型是从欧洲大学向美国本土大学的转型。哈佛大学虽然受到了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深刻影响，但是实际上这些模式从没有成为左右哈佛大学发展的力量，因为哈佛从未囿于这些外来模式的限制，它在模仿的同时，总能从所处社会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对这些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哈佛的经验说明，当组织结构和所处环境不平衡时，根据环境对组织进行改造和创新是必经之路，而如果组织原有的模式是外来模式，那么这种改造和创新就是组织模式本土化的过程。相对于牛津、剑桥等古典大学来说，哈佛大学也是后发外生型的，它在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模仿与本土化的问题。尽管哈佛大学经历了美国大学、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三次转型，但是这些转型的核心是从欧洲大学向美国本土大学的转型，只是在这一本土化的过程中，它的模式越来越体现出优越性，为美国以外的很多大学所效仿，它因引领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被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归根到底，大学转型的核心是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并不断追求卓越，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必须在本土发挥引领和榜样作用。

第四，哈佛大学在转型过程中创造了多种新型组织制度和模式，不断突破着原有组织形态的限制，因此组织创新是组织转型的关键路径。整个哈佛大学转型史就是它的组织制度和模式创新史，在这些创新中，有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如学位授予制、“二元制”管理模式、教师学术职业制度等；也有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如选修制、集中与分配制、通识教育改革、核心课程改革等；还有科学研究方面的创新，如专业学院改造、研究生院改造、独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等。在这些组织制度和模式创新中，有的是哈佛原创，如选修制等，也有的是哈佛对其他大学做法的改进，最典型的是对研究生院的改造。总之，组织创新是哈佛大学组织转型的关键路径，只有对组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革，组织才能从旧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活力和发展。

第五，校长和联邦政府是哈佛大学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很多因素在哈佛大学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但是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是校长和联邦政府。哈佛大学的“双院制”管理模式使得校长成为大学管理体制中的核心和枢纽，他连接着监事会和董事会，也连接着

政府、校外人士、校内行政机构、教师、学生等各个群体，因此，在哈佛大学的发展中，校长发挥着凝聚、引领和协调的作用。同时，联邦政府在哈佛大学的转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联邦政府在赠地学院时期以及在二战后对哈佛大学的扶持，哈佛大学才逐渐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联邦政府并非以控制的方式对哈佛施加影响，克拉克·克尔将这种影响总结为“以微妙的、缓慢积累的和彬彬有礼的方式使得自己显得愈加有力”，换句话说，联邦政府对哈佛的影响是渗透式的而非控制式的，这也是像哈佛这种老牌私立大学能够愿意接受联邦拨款的主要原因。

（赵婷婷，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教授，郭曼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10期）

主 编: 王新清  
常务副主编: 柴宝勇  
执行副主编: 高迎爽  
责任编辑: 王宇昕 石晓男 王龙韵  
电 话: 010-81360206  
邮 箱: gjs@ucass.edu.cn  
地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于大街 11 号